

## 愛與慾的辯證

——從愛瑪·高德曼在中國的譯介  
談北伐前後無政府主義者的性愛論述

許 慧 琦<sup>\*</sup>

### 摘 要

1920年代的中國，不僅出現政治動盪、政黨勃興與社會劇變等局面，也是受外國思潮影響而流行的自由婚戀與新性道德等言行普及的關鍵年代。作為曾經在五四時期啟迪青年學子爭自由、抗強權、求解放的無政府主義，在動員時人從事社會革命的能量，到了1920年代中期，因國共勢力的崛起而急速縮減。不願加入國共陣營、堅持純粹無政府主義路線的激進無政府主義青年，如何在不利於其革命活動的大環境中，爭取發聲、宣揚無政府主義理念呢？

本文透過中國無政府主義者對俄裔美國無政府主義者愛瑪·高德曼(Emma Goldman, 1869-1940)的著作譯介，來考察這群激進分子在北伐前後的論述特色及其時代意涵。筆者將從高德曼的思想言論自20世紀初葉以來在中國的傳播出發，尤其偏重她的情愛論述在1920年代被演繹的過程，探討扮演譯介與宣揚角色的無政府主義者，如何在翻譯與承繼高德曼的情愛論見之餘，展演出意圖取而代之的新性愛

---

<sup>\*</sup> 作者現為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

論述，來參與並回應中國社會的實際問題。本文說明，無政府主義者對高德曼情愛論述從選譯到揚棄的始末，必須被置於 1920 年代中國政治與社會情勢演變、及無政府主義者欲突破革命困境的時代脈絡中，加以理解與詮釋。

關鍵詞：無政府主義、愛瑪·高德曼 (Emma Goldman)、非戀愛論、性愛論述、1920 年代

**The Dialectics of Love and Sex:**  
Chinese Anarchists' Sex Radicalism via  
the Translation and Adaptation  
of Emma Goldman's Works in the 1920s

Rachel Hui-chi Hsu<sup>\*</sup>

Abstract

China in the 1920s saw the rising tide of free love/marriage and new sexual morality imported from abroad as it underwent sociopolitical upheavals. Anarchism, which had greatly inspired intellectuals and students with its antimilitarism and cultural iconoclasm in the 1910s, began to lose its edge in rivalry with the National Party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during the next decade. Refusing to collaborate with these two political parties, Chinese young anarchists strove to contribute to social revolution in their own radical, anarchistic way. How did they manage to do i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anarchists' discourses in light of their translation and adaptation of the

---

<sup>\*</sup>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sex radicalism of Russian American anarchist Emma Goldman (1869-1940). I chart the cross-cultural circulation of Goldman's anarchism since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with the focus on the rendition of her idea of free love by the Chinese anarchists in the 1920s. By doing so, I showcase the revised sex radicalism of Chinese anarchists in the process of their dialectic thinking and criticism of Goldman's free love. Their dialectic thinking of Goldman's free love, this article reveals, could only be grasped in the context of sociopolitical change in 1920s China as anarchists sought their breakthrough in their pursuit of social revolution.

Keywords: anarchism, Emma Goldman, anti-love theory, discourses on sexual love, the 1920s

## 愛與慾的辯證

——從愛瑪·高德曼在中國的譯介  
談北伐前後無政府主義者的性愛論述

許 慧 琦

### 緒 論

無政府主義，是一種挑戰所有形式的統治與權威的政治哲學思想。對所有社會的當權或既得利益者而言，無政府主義無異於洪水猛獸。相對地，某些對社會不滿，亟欲打破現狀的理想主義分子，則易受無政府主義張揚自由、注重個性發展的精神吸引，進而信奉該學說。自19世紀中後期以降，當西方眾多國家乃至中國社會，因各種因素而產生變動之際，無政府主義常扮演某種宣傳改變、煽動革命與挑戰政府的思想觸媒角色。此外，無政府主義思想不只強烈反對政府統治與資本主義，也在家庭、婚姻、兩性及性關係課題上，提出破壞現狀體制的激進訴求。《天義》（1907-1908）與《新世紀》（1907-1910）這兩份於20世紀初分別發行於東京與巴黎的中國無政府主義刊物，便刊載不少批評家庭制度與抨擊婚姻體制之文。主持《天義》的何震（1884-1920?），更強烈批判傳統禮教與父權體制，甚至不憚表達憎恨男性的女性主義思想。天義派與新世界派，聯袂揭開了近代中國無政府運動的序幕。此後的二十餘年間，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從反傳

統、反權威的立場出發，發表婦女解放與重塑兩性關係的觀點。德國史家顧德琳（Gotelind Müller）在〈知易行難：中國無政府主義的婦女性別論述及其落實限制〉文中，區分了中國無政府主義者在清末（1907-1912）、民初（1912/1915-16）、五四（1917-1920年代中）、及1920年代晚期到1930年代早期，具有不同階段性的婦女性別論述。顧德琳除了說明何震的女性主義具有「禁慾」的特色，且其思想後繼無人之外，也介紹俄裔美國無政府主義領袖愛瑪·高德曼（Emma Goldman，1869-1940）的女性主義在五四時期的傳播。<sup>1</sup>

顧文揭露高德曼的譯作曾現身近代中國的歷史發展，雖有其學術貢獻，但關於高德曼在中國的敘述，卻存在幾處需要深化、釐清或修正的論點。首先，顧德琳雖指出高德曼的著述曾在五四時期發揮影響，卻未從史料中發現中國譯介高德曼情愛論述的高潮，乃是在五四過後。<sup>2</sup>實則，顧文曾簡單提及的盧劍波（1904-1991），曾在時值北伐的1920年代後半期，主導了一波集中宣揚高德曼情愛作品的譯介潮。其次，顧文認為盧劍波「得到高〔德〕曼女性主義的真傳」。然而，盧劍波不僅未如高德曼那般，因支持每個人情慾的自由表達而為同性戀辯護，更曾揚棄高德曼的自由戀愛觀而主張「非戀愛」論。進而，顧文在介紹無政府主義性別論述的第四階段（1920年代晚期到1930年代早期）時，雖提過盧劍波的妻子鄧天喬（?-1986），卻似因無法掌握相關史料（顧德琳寫道：「盧氏的作品到現在都已經很難找到了，更不用說她的妻子鄧天喬的了。」），而表示當時已「提不出任

<sup>1</sup> 顧德琳（Gotelind Müller）著，洪靜宜譯：〈知易行難：中國無政府主義的婦女性別論述及其落實限制〉，收於游鑑明、羅梅君、史明主編，洪靜宜、宋少鵬等譯：《共和時代的中國婦女》（臺北：左岸文化，2007年），頁62-86。

<sup>2</sup> 美國史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1940-1917），也曾指出高德曼關於戀愛與家庭的作品，在五四時期廣為流行，但他同樣未對此做進一步的討論與說明。見 Arif Dirlik, *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179.

何具有代表性的女性人物」。<sup>3</sup> 其實，不論是章錫琛（1889-1969）主編的《新女性》月刊，或盧劍波與鄧天喬共同出版的《新婦女的解放》（1928）與《婦女解放與性愛》（1928），都可見鄧天喬篇幅不少的情愛與性慾論述，且其論點都大致呼應高德曼的思想。鄧天喬的著述及其情愛觀，不應被忽略。

上述這幾點的歷史意義，在於其交織出1920年代的中國無政府主義者，從兩性情慾出發而闡述的性解放與社會革命理念。這些自五四時期廣受報刊媒體熱烈討論的問題，到了國共政黨領銜挑戰軍閥政權的北伐階段，在持續受關注之際，也衍生出某些新的課題與論點。較為人所知者，當屬曾在國共陣營熱烈進行過的「革命與戀愛」討論，以及新性道德、節制生育、同性戀或獨身等圍繞情慾的主題。<sup>4</sup> 當時一小群無意依傍國民黨，也不願加入共產黨的無政府主義青年，除了透過組織與寫作，勉力進行在政治鬥爭上已無力回天的無政府主義宣傳之外，還為愛慾等課題貢獻不少著述。這些反抗所有形式的統治與權威的激進知青，藉由思索及闡釋戀愛、性慾與人類愛之間的關聯，發表符合其心目中無政府主義理想的看法。而高德曼的作品，正在這群無政府主義青年中，扮演著重要的啟迪與催化角色。

本文從高德曼作品的中文譯介視角出發，兼具歷時性與共時性地檢視以下三大脈絡，以考察北伐前後無政府主義者的性愛論述：一、透過探討高德曼的言行在近代中國的傳譯過程，觀察不同世代的無政府主義者關注點的差異，由此闡明其在北伐前後所發表的性愛論述重點。二、從1920年代全球與中國無政府主義運動的困境出發，審視當時中國無政府主義青年如何以高德曼的作品為橋樑，來回應外來思潮與思考自身發展。三、將無政府主義者的性愛著述，對照於中共

<sup>3</sup> 顧德琳著，洪靜宜譯：〈知易行難：中國無政府主義的婦女性別論述及其落實限制〉，頁62-86。

<sup>4</sup> 關於「革命與戀愛」的討論，見呂芳上：〈192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有關情愛問題的抉擇與討論〉，收於呂芳上編：《無聲之聲（I）：近代中國的婦女與國家（1600-1950）》（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頁73-102。

及自由派文人的相關思想，以凸顯前者論點的特色，並剖析其論述本質。本文將說明，中國社會有關高德曼言論的早期介紹，並未強調她在婦女解放及情慾自由方面的主張。要到五四結束、北伐方殷的1920年代後半期，高德曼有關婚戀與性慾的論見，才透過幾位無政府主義青年的譯述，密集出版並引發討論。他們進而超越高德曼主張性愛自由的論見，形構出「非戀愛論」此一更激進的新性愛論述，主張以具有普世價值的人類愛，取代其認為帶有自私特性的戀愛。

這群無政府主義青年對高德曼自由戀愛論的激進轉譯始末，與1920年代的中國政治社會情勢，以及無政府主義者欲突破革命困境的策略發展，息息相關。1920年代的中國社會，經歷了種類繁多的革命論述與實踐，諸如國民黨的「國民革命」、共產黨的「階級革命」、青年黨的「全民革命」，以及無政府主義以小團體支持工運或文字宣傳的「社會革命」等。<sup>5</sup>無政府主義原在1910年代備受青年學子青睞與討論，卻在1920年代初期民族主義與救亡呼聲漸趨高漲之際，與馬克思主義信仰者經歷一陣激辯之後，敗下陣來。<sup>6</sup>一些思想激進的無政府主義青年，身處北伐這個由政黨大規模動員社會群眾對抗軍閥或帝國主義強權的革命階段，所能發揮的活動與言論空間，都比五四時期來得狹隘而受限。<sup>7</sup>當時，無政府主義者在團體組織或出版刊物上，規模多不如五四時期那般興盛。少數熱情不減的無政府主義青年，卻仍鏗而不捨地透過報刊譯介相關外來著述，以期增進時人對無政府主義的興趣與理解，推動無政府主義的社會革命。在革命激越與社會進化的理念驅使下，幾位無政府主義青年，自覺必須超越高德曼的性激進主義，以貫徹無政府主義的絕對自由信念。高德曼的情

<sup>5</sup> 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一九二〇年代中國三大政黨的實際互動〉，《歷史研究》第5期（2004年10月），頁84-105。

<sup>6</sup> 蔡國裕：《一九二〇年代初期中國社會主義論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8年），頁263-363。

<sup>7</sup> 阿里夫·德里克著，孫宜學譯：《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6年），頁185-263。



愛言論在北伐前後中國社會的傳播，經歷了被無政府主義者選譯、闡述進而揚棄的過程。其間的辯證性思想演變，足為檢視中國知識分子如何因應國內情勢，取捨與反芻外來思想的適切例證。

本文的主要論點是，北伐前後與國共對立的一群無政府主義青年，在譯介與企圖超越高德曼論述的愛慾辯證過程中，展現出兼具個人自由 (individual liberty) 訴求與社會團結 (social solidarity) 精神的無政府共產主義 (anarchist communism) 思維。<sup>8</sup> 筆者將透過上述三大交織脈絡，考察這群生活清苦、思想激進卻陳義過高的無政府主義知青，面對著苦悶的政治情勢與社會現實，如何藉由思索愛與慾的辯證發展，發出其無政府主義的理想呼聲。這個呼聲雖或微弱甚至短暫，卻在歷史上留下中國無政府主義者創發性地回應國際思潮、與反思國內問題的蹤跡。

## 一、西方無政府主義脈絡中的高德曼：

### 桀驁不馴的性激進主義者

高德曼之名，至遲在 20 世紀初，已出現於中國報刊；但她的著作，到五四早期才漸受知識界重視與翻譯，主要集中於與北大師生相關的刊物中。除卻蒲魯東 (Pierre-Joseph Proudhon, 1809-1865) 與克魯泡特金 (Peter Kropotkin, 1842-1921) 等備受矚目的男性大師，以及巴黎公社領袖梅曉若 (Louise Michel, 1830-1905) 之外，高德曼是最為當時中國進步知識界所知的西方女性無政府主義領袖。民國時期有關高德曼生平、言行及論著的報導與譯介，幾無例外地由無政府主義者一手包辦。因此，高德曼的思想在中國的傳播軌跡，清楚地呈現在無政府主義者的翻譯、接受與反思過程中。

---

<sup>8</sup> "Observations and Comments," *Mother Earth* 3, no. 9 (November 1908): 340.

欲瞭解高德曼為何受五四前後的中國無政府主義者青睞，首須從她在西方無政府主義陣營中的地位與主張談起。高德曼出生於俄國立陶宛考夫納市（Kovno）一個沒落的猶太家庭中，早年曾受俄國革命風潮中數位女性英勇表現的啟迪。<sup>9</sup>1885年，她與同父異母的長姊飄洋過海，到美國投靠二姊，居住於紐約州羅徹斯特（Rochester）約達四年，在成衣工廠工作，並經歷過一段失敗的短暫婚姻。1886年5月4日發生於芝加哥的乾草市場爆炸事件（Haymarket Affair），及市政當局對無政府主義者不公正的判刑經過，深深刺激了有反抗威權天性的高德曼，使她毅然決定獻身無政府主義的革命志業。<sup>10</sup>1889年她隻身前往紐約，成為紐約下東區無政府主義團體的初生之犢，並迅速竄為雄辯滔滔的無政府主義演說家。1906年3月1日，高德曼與無政府主義同志共同創辦的《大地之母》月刊（*Mother Earth*, 1906-1917），成為無政府主義者、激進主義者及左派文藝創作者的交流園地。高德曼充分運用每年的全國巡迴演說、著書立論及抗爭運動等方式，在20世紀初年的美國左翼陣營中奠下聲望，成為最受輿論矚目與警方鎖定的無政府主義領袖。美國媒體與官方形容她為「無政府主義之后」，乃至於「世界上最危險的女人」。<sup>11</sup>

<sup>9</sup> Alice Wexler, *Emma Goldman: An Intimate Lif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4), 3-24.

<sup>10</sup> 芝加哥乾草市場爆炸事件，乃該市的勞資對立引發的罷工抗議者向警方投擲炸彈並導致傷亡之事。此使芝加哥市的無政府主義者及激進主義者，全被輿論批評為恐怖分子，被警方視為可疑嫌犯加以搜捕。在反無政府主義及反外來勢力的恐慌氛圍中，八位無政府主義者被指控並接受審判，後有四人於1887年11月11日被公開行吊刑處死，一人於獄中自殺。此一轟動全國視聽的事件，對美國激進工運造成沉重打擊，但也啟發不少左傾分子對無政府主義的同情與興趣。Paul Avrich, *The Haymarket Traged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sup>11</sup> Alix Kates Shulman, "Dancing in the Revolution: Emma Goldman's Feminism," in *Feminist Interpretations of Emma Goldman*, eds. Penny A. Weiss and Loretta Kensingler (Pennsylvania: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7), 241-253.

高德曼強調性與兩性問題在無政府社會革命中的重要性，與以克魯泡特金為宗的無政府共產主義者之論見，有相當出入。<sup>12</sup> 即使她與所有無政府主義者同聲一氣地，反對國家、政府與教會，批判所有強權及軍國主義，並支持勞工向資方與政府抗爭，卻不受這些無政府主流訴求所限。她充分發揮無政府主義要求自由與自主的精神，來處理當時備受重視的性問題與女性問題上。後世史家將她對於情慾自主、婦女（與兩性）解放、性別平等、節制生育、與性教育的主張，稱之為性激進主義（sex radicalism）。<sup>13</sup> 高德曼曾因對性激進主義的堅持，與其精神導師克魯泡特金產生意見分歧，甚至受到某些無政府同志的非難與排擠。<sup>14</sup> 然而，她從未因此放棄自身對性自主與女性解放的堅持。高德曼在美國進行的年度巡迴演說內容中，經常觸及這些課題。她在1910年出版的論文集《無政府主義及其他論文》（*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也有多篇涉及女性解放及戀愛等主題。1917年，高德曼與（曾為其情人的）終生同志亞歷山大·柏克曼（Alexander Berkman, 1870-1936）因反對徵兵制，入獄兩年。兩人出獄後，隨即被美國政府遣返回俄國，卻因不滿於俄國大革命後的蘇聯極權統治，於1921年底再度離開母國，流亡西歐。<sup>15</sup> 1920年代的高德曼，持續透過演講、出版與書信等方式，向大眾及友人表達堅持反權威、捍衛個人自由與社會合作的共產無政府主義精神，其中包括傳播蘇俄革命女性的英勇言行與性愛自由的論述。<sup>16</sup>

<sup>12</sup> John C. Chalberg, *Emma Goldman: American Individualist* (New York: Pearson Longman, 2008), 89-90.

<sup>13</sup> Linda Gordon, *The Moral Property of Women: A History of Birth Control Politics in Americ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2), 142.

<sup>14</sup> Emma Goldman, *Living My Life: An Autobiography of Emma Goldman*, Vol. On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31), 252-253.

<sup>15</sup> Alice Wexler, *Emma Goldman in Exile: From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o the Spanish Civil War* (Boston: Beacon Press, 1989).

<sup>16</sup> 例見 Emma Goldman, "Women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n *The Emma Goldman Papers: A Microfilm Edition*, eds. Candace Falk et al. (Alexandria: Chadwyck-Healey Inc., 1991-1993), reel 50; Emma Goldman, "Methods of Birth Control,"

高德曼堅信，女人追求獨立、自主與解放的最大障礙，來自她的家庭與私生活中的種種箝制與壓迫。女人惟有打破家庭這個牢籠，並不再受男人及其性需求役使，體察與聆聽自己的身心慾望，才能發展完整且健全的自我。高德曼的婦女解放訴求，既與當時美國婦女運動主流的投票權（women's suffrage movement）陣營有別，也不同于像紀爾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1860-1935）那類自外於投票權陣營、卻對性頗為保守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sup>17</sup> 原則上，在社會經濟層面，高德曼是個無政府共產主義者，主張出於個人自願的平等合作，生產與流通貨物，各盡所能，各取所需。<sup>18</sup> 但在私生活與兩性關係領域，她強調個人自由與獨立自主的重要性，並主張女性的內在革命（inner revolution），以真正掙脫尊男抑女的傳統積習與雙重性道德觀。高德曼熱情、浪漫且重視與男人的性愛，卻從未屈服於任一情人要她留守家庭相夫教子的要求。她甚至為求專心致力於社會革命，選擇不生小孩。她不只重視經濟因素，也看重社會一性議題（socio-sexual issues），致力揭露父權家庭的本質及其權力運作，並批判諸如性壓抑（她稱之為清教徒道德〔puritan morality〕）、育兒責任、婚姻制度等不利女性發展的思想與體制。<sup>19</sup>

高德曼的性激進主義，融合了歐洲的性學與無政府主義哲學，旨在提倡解放與平等的異性戀親密關係，以此重塑兩性文化。她尤其呼應英國性學家靄理士（Havelock Ellis, 1859-1939）的觀點，認為男女之間的性愛歡愉，既是人性本能與個體性的展現，也是社會／種族進化與婦女解放的基礎。<sup>20</sup> 高德曼與靄理士一樣，視性慾為人類「最自

---

in *The Emma Goldman Papers: A Microfilm Edition*, eds. Candace Falk et al. (Alexandria: Chadwyck-Healey Inc., 1991-1993), reel 53.

<sup>17</sup> Tracy Fessenden, *Culture and Redemption: Religion, the Secular,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161-180.

<sup>18</sup> Emma Goldman, "Free Communism," *Mother Earth* 7, no. 5 (July 1912): 155.

<sup>19</sup> Shulman, "Dancing in the Revolution," 241-253.

<sup>20</sup> Jeffrey Weeks, "Havelock Ellis and the Politics of Sex Reform," in *Socialism and the New Life: The Personal and Sexual Politics of Edward Carpenter and*

然、最健康的本能」，對生活幸福和人類自由至關重要。愛情對她而言，是「生命中最強大、最深邃的要素」；在愛人的無私奉獻中，存有著至高的喜悅。<sup>21</sup> 高德曼主張戀愛與性慾，是一個女人「在最真實的意義上活得像個人」的關鍵。因此，在戀愛與性慾上尋求得以讓女人（與男人共同平等地）自由表達與獲得幸福之道，是高德曼性激進主義的核心。<sup>22</sup>

高德曼從19世紀末以來，在美國社會推動各種無政府主義活動的卓越貢獻，使她受到國際無政府主義後進的重視與崇拜。時至20世紀初，高德曼已儼然躍為在國際無政府運動中，最具知名度的美國無政府主義者。她不斷以高昂的鬥志與熱情的批判精神，鼓舞同志並支持群眾。她的無政府領袖聲望及思想論見，首先從美國向歐洲各國與澳紐傳布，進而向東亞散播。清末在東京與巴黎的中國留學生，最早接受西方無政府主義思潮的洗禮，因此接觸了高德曼的著述，並開啟中國社會對高德曼的譯介。1917年，高德曼之名，已出現在代表新文化思維的《新青年》上。到1920年代，她更成為無政府知識青年譯介的主要對象之一，在中國知識界發揮啟迪思考、刺激討論的影響力。

## 二、進入中國：五四前後的高德曼相關譯介

高德曼之名進入中國出版界的時間點，還早過在東京出版的《天義》與在巴黎出版的《新世紀》。1903年，剛留學日本且與東京「天義」派過從甚密的蘇曼殊（1884-1918），在《國民日日報》發表了一篇〈女傑郭耳縵〉短文，應為高德曼之名出現於中國知識界之始。該

---

*Havelock Ellis*, eds. Sheila Rowbotham and Jeffrey Weeks (London: Pluto Press, 1977), 141-185.

<sup>21</sup> Goldman, *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 227-239, 231.

<sup>22</sup> Goldman, *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 219-245.

文僅用數語勾描高德曼早年生平，及其遭美國警方打壓卻無畏懼的表現。<sup>23</sup> 同年出版的《世界十女傑》與《世界十二女傑》，在介紹法國無政府主義領袖路易斯·米歇爾（Louise Michel，1830-1905）之時，也提及了高德曼之名。<sup>24</sup>

高德曼不只重視跨大西洋的社會革命網絡，也同樣積極發展與太平洋彼岸無政府主義者的同志情誼；此可見諸於數份中國與日本無政府主義刊物對她的介紹。由何震與劉師培（1884-1919）夫婦合辦的《天義》，在1907年第6卷的〈新刊介紹〉中，宣傳了高德曼的《大地之母》。<sup>25</sup> 由該文可知，高德曼曾寫信給日本著名無政府主義者幸德秋水（1871-1911），請他向何震等人，轉達對《天義》出版的恭賀與祝福之意，並表達日後與中、日兩國無政府主義同志晤面的願望。高德曼還寄贈一份《大地之母》給天義社，以茲交流。<sup>26</sup> 此或可謂高德曼與中國無政府主義者最早的接觸。較早與高德曼保持聯絡的中國本土無政府團體，則屬廣東的劉師復（1884-1915）。他所主編的《民聲》週刊，是民初最早介紹高德曼的刊物。1914年4月，該刊一篇名為〈美國無政府黨之歷史〉的譯文，將高德曼形容為舌燦蓮花的無政府主義演說大家，「鼓吹無政府甚力，著作極富」。<sup>27</sup> 同年7月，《民聲》主編臚列了西方重要的無政府主義著作及刊物，其中包括高德曼的《無政府主義與各派的言論》（*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無政府主義》（*Anarchism*）、《工團主義》（*Syndicalism*）、《結婚與戀愛》（*Marriage and Love*）、《祖國主義》（*Patriotism*）。劉師復並將《大地之母》與克魯泡特金陣營在倫敦出版的《自由》（*Freedom*），

<sup>23</sup> 子穀（蘇曼殊）：〈譚苑·女傑郭耳縵〉，收於東大陸圖書譯印局編：《國民日日報彙編》第3集（上海：東大陸圖書譯印局，1904年），頁801-803。

<sup>24</sup> 季家珍著，楊可譯：《歷史寶筏：過去、西方與中國婦女問題》（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200。

<sup>25</sup> 〈新刊介紹〉，《天義》第6卷（1907年8月），頁36。

<sup>26</sup> 〈新刊介紹〉，頁36。

<sup>27</sup> 涓聲譯：〈美國無政府黨之歷史〉，《民聲》第5號（1914年4月11日），頁54-55。



並列為兩大重要的國際無政府主義刊物。<sup>28</sup>《民聲》的其他文章，顯示出劉師復不只熟悉高德曼的著述，推崇她所編輯的刊物為美國社會中最重要「無政府報」，且與高德曼保持書信聯繫與作品往返。<sup>29</sup>

高德曼的思想真正進入中國，主要是在五四時期。時人譯介的高德曼作品種類多元，雖包括、卻不只限於婚戀課題。堅決反傳統並批判強權的無政府主義，在啟蒙與愛國熱潮交互激盪的五四階段，成為新文化論述的重要部分，頗吸引充滿熱情理想的青年學子。他們投身研讀與傳播各種無政府主義著作，並嘗試實踐無政府主義式的工讀互助或新村生活。<sup>30</sup>高德曼的著作，在此時隨著克魯泡特金等人的作品，一同現身中國進步報刊中。<sup>31</sup>1917年7月，高德曼的〈愛國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兩篇譯文，出現於北大學生黃凌霜（1901-1988）、袁震瀛（1896-1979）、趙太侔（1889-1968）等人組成的「實社」之刊物《實社自由錄》第1集。<sup>32</sup>〈愛國主義〉批判國家如何利用愛國主義這個意識形態，將一個有思想的人，變成效忠當權而無省思能力的機器，並使每個國家壁壘分明，徒增傲慢、自負與自我中心主義等人類劣根性。〈無政府主義〉則闡釋此一主義，乃「根據自由

<sup>28</sup> 〈通信討論欄·答岸父〉，《民聲》第18號（1914年7月11日），頁12；〈通信討論欄·答岸父（續十八號）〉，《民聲》第20號（1914年7月25日），頁12。

<sup>29</sup> 〈高曼女士〉，《民聲》第21號（1914年8月2日），頁241。

<sup>30</sup> 阿里夫·德里克著，孫宜學譯：《無政府主義與五四新文化——圍繞《新青年》同人所作的考察》，頁139-184。孟慶澍：《無政府主義與五四新文化——圍繞《新青年》同人所作的考察》（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79-207。

<sup>31</sup> 關於當時中國對克魯泡特金的思想譯介，例見〈克魯泡特金的「無治主義略說」〉，上海《民國日報》第1-2版，覺悟副刊，1920年8月9日。另見李存光編：《無政府主義批判：克魯泡特金在中國》（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

<sup>32</sup> 實社是北大學生黃凌霜等於1917年5月所創的無政府主義社團。見葛懋春、蔣俊、李興芝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頁1061。

之原則，以討求新社會秩序之哲學」。<sup>33</sup> 另外，影響力深遠的《新青年》，於1917年7月與1919年2月，分別刊載由袁震瀛（1894-1979）譯的〈結婚與戀愛〉及〈近代戲劇論〉兩篇高德曼的著作。<sup>34</sup> 上述四篇文言體的譯文原典，都選自高德曼於1910年出版的《無政府主義及其他論文》一書。不過，〈愛國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只是對原文的節譯，《新青年》那兩篇譯文，則屬全譯。袁震瀛在〈結婚與戀愛〉文末，先簡介了高德曼的生平，之後強調此文「亦女士之傑作」，「凡我男女青年不可不讀也」。<sup>35</sup> 繼《新青年》之後，中國知識界偶可見對高德曼著述的介紹。<sup>36</sup> 1920年代，是國際無政府主義運動備受馬克思主義挑戰的時期。包括高德曼在內的外國無政府主義領袖，都熱情地致信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或相關團體，希望鼓舞這些青年後輩持續從事無政府主義活動。<sup>37</sup> 秦抱朴（1901-?）算是當時極少數不僅與高德曼有書信往返，更獲機會與她會面的中國無政府主義者。秦抱朴在1921年進入俄國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就讀時，經克魯泡特金夫人介紹，與那時被美國政府強制遣返俄國的高德曼，有過多次會晤，並深受其思想影響。<sup>38</sup> 高德曼與柏克曼於1919年底被遣返回俄國，因緣際會地參與俄國蘇維埃政權成立後的實際發展，

<sup>33</sup> 高曼女士著，超海譯：〈愛國主義〉，《實社自由錄》第1集（1917年7月），頁1-5；高露曼女士著，霜譯：〈無政府主義〉，《實社自由錄》第1集（1917年7月），頁5-8。

<sup>34</sup> 美國高曼女士著，震瀛譯：〈結婚與戀愛〉，《新青年》第3卷第5號（1917年7月），頁1-9；美國高曼女士著，震瀛譯：〈近代戲劇論〉，《新青年》第6卷第2號（1919年2月），頁179-195。

<sup>35</sup> 美國高曼女士著，震瀛譯：〈結婚與戀愛〉，頁9。

<sup>36</sup> 例如1920年代前後的《解放與改造》與《自由人》，及由無政府主義者（亦為同盟會會員）景梅九（1882-1961）主編的北京《國風日報》副刊「學匯」（1922-1923）。盧劍波：〈序言〉，收於高德曼女士著，盧劍波譯：《自由的女性》（上海：開明書店，1927年），頁7。

<sup>37</sup> 鄭佩剛：〈無政府主義在中國的若干史實〉，收於葛懋春、蔣俊、李興芝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下，頁939-971。

<sup>38</sup> 秦抱朴：〈回憶早年留俄及與高德曼相識的經過〉，手抄本。此份資料來自德國海德堡漢學系教授顧德琳，特此深表感謝。



但他們很快便洞察蘇維埃共產政權的專權本質。高德曼於1923年出版《我在俄國的幻滅》(*My Disillusionment in Russia*)一書，成為最早批判俄國共產經驗的重要著作之一，而受到中國無政府主義者的重視。該書在同年隨即被中國無政府主義者翻成中文，以《布爾什維克之暴政》的標題示之。<sup>39</sup> 其後，無政府主義者沈仲九(1887-1968)在無政府主義報刊《民鐘》，發表〈告共產黨的青年(下)〉一文，援引高德曼對俄國革命的批評與分析，論說俄國革命既非社會主義革命，領導革命的布爾塞維克黨亦非無產階級專政，而是資本主義的專制政府。<sup>40</sup>

整體而言，這些五四前後對高德曼著述及生平的譯介，主要集中在她對無政府主義整體概念與意義的闡釋，尤其宣揚她反強權反資本主義的言行，並未凸顯其性激進主義的思想。當時的譯介者泰半為無政府主義者，且多以大學知識青年為主。登載這些譯述的出版品，都是以傳播新思想為職志，且批判性強的同人雜誌或機關刊物，其中大部分屬無政府主義刊物。這些譯述文本的內容，除了《新青年》那兩篇袁震瀛的譯文之外，皆以高德曼對無政府主義政治哲學的論見為主，間亦援用她對1917年俄國大革命後續發展的分析批判。雖然袁譯的〈結婚與戀愛〉一文，可謂高德曼闡述自由戀愛與批判婚制的力作，但它並未如翌年5月同樣由《新青年》刊載的〈貞操論〉(與謝野晶子〔1878-1942〕原著)、或6月號的〈易卜生主義〉一般，在當時中國知識圈或出版文化界引發迴響與討論。下一節將說明，高德曼對結婚的抨擊，拆解戀愛與結婚的關聯，以及強調自由結合、自由母性的意義等論述，要等到1920年代中期，才再度被發掘，並真正進入國人討論的言說範疇。

<sup>39</sup> 高德曼原著，菁華清譯：《布爾什維克之暴政》，1923年出版。見葛懋春、蔣俊、李興芝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下，頁1083。

<sup>40</sup> 天心(沈仲九)：〈告共產黨的青年(下)〉，《民鐘》第2卷第4、5期合刊(1927年5月25日)，頁265-286。

### 三、發現情慾：北伐前後無政府主義青年

#### 對高德曼的（再）譯述

時至 1920 年代中期，一群反國共政黨意識形態的無政府主義知識青年，透過闡揚高德曼的情愛思想來討論中國社會問題，乃至從中展演成青出於藍的性愛論述。這群人包括盧劍波、毛一波（1903-1996）、張履謙（生卒年不詳）、巴金（1904-2005），與盧劍波的愛人同志鄧天喬等。他們雖早在五四階段便受無政府主義啟發，但主要是到北伐前後，才真正開始介紹與發揚高德曼關於情愛的言論。跟秦抱朴相同，盧劍波和巴金都曾與高德曼維持過書信往來。<sup>41</sup> 無獨有偶地，這幾位當時信仰堅定且崇信高德曼思想的無政府主義者，都來自四川。四川雖身處內地，遠離上海等西潮洶湧的沿海都市，卻因軍閥長年混戰，地主階級壓迫剝削，使生活困頓的人民亟思改變現狀。約在辛亥革命前夕，四川有些人開始接觸無政府主義。到五四時期，以陳小我（生卒年不詳）為首的無政府主義者，在重慶等地進行相關宣傳活動，使更多四川人有機會接受無政府主義思想的洗禮。<sup>42</sup> 少數有志青年先後出川，遠赴上海、南京等沿海大城求學發展，並繼續參與或組織無政府主義團體。其中更積極者，選擇創辦相關刊物，以向大眾宣揚無政府主義理念。<sup>43</sup> 這些四川激進知青，對無政府主義拯救中國都充滿信心，並從同鄉、同學發展為同志關係，建立起深厚的革命情誼。他們在五四後大環境丕變的 1920 年代中期，不依附國共兩黨，

---

<sup>41</sup> 巴金：〈信仰與活動〉，《巴金全集》第 12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 年），頁 403-407。Brenda Butler, Lu Jian-Bo, 1 November 1989, Emma Goldman Archiv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alifornia, USA.

<sup>42</sup> 蔣俊：〈盧劍波先生早年的無政府主義宣傳活動紀實〉，收於葛懋春、蔣俊、李興芝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下，頁 1009-1022。

<sup>43</sup> 劍波、履謙：〈敬告四川同志〉，《國風日報》第 172 期學匯副刊（1923 年 4 月 19 日），頁 5-6。

堅持無政府共產主義路線。民初以來，北京、廣州等無政府主義陣營較早發展，頗具規模；這些人各建立其既有的組織與活動圈，難免帶某種地域排他性。因此，早在出川前即互相認識的無政府主義青年，自然地在赴沿海城市發展之後，不以加入既有團體為主要的活動模式，而是以川籍友人同志為主，志同道合地自組新團體，來宣揚他們心中的無政府主義。

這群在北伐階段生活清苦、甚至經常貧病交加的激進青年，除了在政治宣傳與組織動員上，與國共進行艱辛的角力之外，也企圖透過當時備受輿論重視的戀愛問題，發表其無政府主義論見。1920年代以降，改組的國民黨與崛起的共產黨主導革命話語和國民革命的進展，影響著中國的政治情勢、思想氛圍、社會發展與出版文化。此時的無政府主義者，在國共先合後分地企圖壟斷國民革命運動的局面下，面臨前所未見的挑戰與困境。這些不願與任何政黨合流的無政府主義青年，力抗馬克思主義者及中共成員的抹黑與批判，同時也反駁國民黨的資產階級國民革命。他們努力地在國共勢力不斷擴張之際，為無政府主義式的無產階級社會革命，尋求理論與行動的立足點。<sup>44</sup>以盧劍波為例，他在青年求學時代接觸了無政府主義等外來激進思想，很快便受啟發並參與相關活動。1922年春，他離開四川求學，開始在南京與上海等地積極推廣無政府主義。<sup>45</sup>盧劍波與不少跟他年齡相仿、志趣相投的青年一樣，以出版刊物與組織團體為傳播無政府主義之道。他從1923至1928年，先後在南京與上海成立民鋒社所發行的《民鋒》雜誌，與《黑瀾》、《土撥鼠》、《時與潮》等短期刊物，宣揚其無政府共產主義信念。<sup>46</sup>1927年8月，盧劍波與民鋒社數位四川同志，共同成立「中國少年無政府共產主義者聯盟」，明言「白色資本帝國主義者與其走狗奉魯系軍閥，紅色恐怖的共產黨與所謂左派

<sup>44</sup> 阿里夫·德里克著，孫宜學譯：《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頁211-227。

<sup>45</sup> 蔣俊：〈盧劍波先生早年的無政府主義宣傳活動紀實〉，頁1009-1022。

<sup>46</sup> 葛懋春、蔣俊、李興芝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下，頁1084-1086。

國民黨的武裝勢力，土產的法西斯蒂——在蔣介石獨裁之下的所謂真正國民黨及其武裝與一切改頭換面的軍閥」，都是殘害與壓迫無產階級的罪人，因而也是該聯盟的敵人。他們堅拒與任何政黨合流的無政府主義立場，異常鮮明。<sup>47</sup> 與此同時，盧劍波也開展另一種宣揚社會革命理念的途徑，即呼應當時深受進步知青重視的戀愛、革命、性慾等討論風潮，發表無政府主義的性愛觀。他採取的主要策略之一，便是從譯介高德曼的相關著作出發，來闡述自由戀愛的解放意涵。

高德曼以自由戀愛為核心的性激進主義，在某種程度上，隨著其他本質有別但主題相似的外國思潮，參與了1920年代中國報刊媒體熱烈進行的婚戀課題。自由婚戀的思想，自清末開始、尤其是五四以來，漸受進步知識界的重視。文化人與青年學子各依自身的意識形態與切身需求，向歐美或日俄等國汲取思想資源，發表對婚姻、家庭與個人情愛生活的種種看法。<sup>48</sup> 當時主張以戀愛結合為前提的自由婚戀觀，嚴峻衝擊著由父母或媒妁代訂的傳統婚制習俗。「戀愛神聖」的理念，和主張靈肉一致、婚姻以戀愛為基礎的「新性道德」論述，一時間流傳開來，獲得眾多知識青年的認同。<sup>49</sup> 戀愛、革命與性慾等討論風潮，成為五四之後中國社會各界共同關注的焦點。在民族革命、社會革命與階級革命呼聲震天的1920年代中期，個人幸福與國族大業的取捨，戀愛與革命孰輕孰重，更是有志青年無法迴避的時

---

<sup>47</sup> 〈中國少年無政府主義者聯盟宣言〉，參見蔣俊：〈盧劍波先生早年的無政府主義宣傳活動紀實〉，頁810-812。由於該宣言最後的宣言署名者為「中國少年無政府共產主義者聯盟」，加上盧劍波自己後來接受口述訪問時，也澄清該聯盟有「共產」二字，所以本文正文處有「共產」二字，但在此一註釋，則維持其無「共產」二字的標題，特此說明。

<sup>48</sup> 楊聯芬：〈「戀愛」之發生與現代文學觀念變遷〉，《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1期，頁158-208。

<sup>49</sup> Haiyan Lee, *Revolution of the Heart: 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 1900-1950*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95-220. 另見許慧琦：〈1920年代的戀愛與新性道德論述及其演變——從章錫琛參與的三次論戰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16期（2008年12月），頁29-92。

代課題。<sup>50</sup> 國共兩黨組織及其機關報、暢銷婦女刊物（如《婦女雜誌》等）、或性學專家（如張競生〔1888-1970〕與潘光旦〔1899-1967〕）等，各自出於不同動機，表達對攸關青年（黨員）的戀愛或性慾問題之立場。高德曼反對婚姻與貞操而提倡「自由戀愛」的性激進主義，成為當時中國知青援用來闡述婚戀與性慾觀點的主要思想來源之一。同樣在1920年代啟迪中國進步思想界，甚至發揮更廣泛影響的，是瑞典教育家愛倫凱（Ellen Key，1849-1926）所提倡的戀愛、結婚與離婚自由，以及「戀愛貞操」論。<sup>51</sup> 此外，還有北伐期間與之後逐漸受國人重視的蘇聯女作家柯倫泰（Alexandra Kollontai，1872-1952）。她主張在偉大的戀愛（great love）能落實於無產階級社會之前，先進行「戀愛遊戲」（game-love）與（以不損害集體利益為前提的）「自由性交」。<sup>52</sup> 這三種愛慾論述，分別有擁護者在革命聲浪高張的五四後中國傳播與倡導，以挑戰根深蒂固的傳統兩性觀。基本上，愛倫凱的理念深受《婦女雜誌》（及其後《新女性》）主編章錫琛（1889-1969）等自由派文人的推崇，以之為準則重整愛、慾與道德之間的關聯。柯倫泰對戀愛深具階級意識分析的論見，在列寧（Vladimir Lenin，1870-1924）領頭武斷地將之詮釋為「一杯水主義」之後，在中國多半被簡化為自由性交，而廣為左翼革命青年男女接受與實踐。<sup>53</sup> 高德曼的自由戀愛論述，到了1920年代，與愛倫凱及柯倫泰都被歸類為反傳統的激進思想，且尤其受到反對婚制的中國青年男女青睞。作家蔣鳳子（生卒年不詳），便曾在其1924年發表於《婦女雜誌》的〈女子解放與女子教育〉論文中，引述高德曼的文字：「女子的發達，女

<sup>50</sup> 呂芳上：〈192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有關情愛問題的抉擇與討論〉，頁73-102。

<sup>51</sup> 楊聯芬：〈愛倫凱與五四新文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2年第5期。

<sup>52</sup> Rachel Hui-Chi Hsu, "Cross-Cultural Sexual Narratives and Gendered Reception in Republican China," *The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14, no. 1 (2020): 111-134.

<sup>53</sup> 柯惠鈴：〈她來了：後五四新文化女權觀，激越時代的婦女與革命，1920-1930〉（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8年），頁176-179。

子的自由，女子的獨立，這定當由女子自己，通過女子自己。第一，不要做性的商品，要主張把她自己做一個人；第二，不論對於誰都當拒絕那奪去自己身體自由的權利。」鳳子表示，「這是歐洲大戰時，母地（Mother Earth）編輯者高曼女士（Goldman）的思想，是中國現在女子所急當澈底了解的。」<sup>54</sup>

以盧劍波為首的無政府主義者，在此一革命浪起，社會變遷與文化轉型交織出媒體熱烈討論婚戀情慾課題的背景下，呼應高德曼的訴求，展開一波密集譯介其相關著述的行動。當時與柏克曼流亡西歐的高德曼，在受英、法、德等政府壓制，苦於難以推展無政府運動之際，從巴金及盧劍波等人的書信中，得知中國社會概況。她便主動請求巴金為她翻譯作品，意在推揚無政府主義精神，以啟發與激勵中國人民追求自我解放。這些堅持純無政府主義路線的青年，在國共聯手主導政治革命的1920年代中期，適逢高德曼展現被譯介的高度意願，盧劍波等人遂策略性地集中譯述高德曼在情愛自由與婦女解放課題的言論。首先，盧劍波於1926年4月，在《新女性》上發表高德曼的〈俄羅斯革命中的婦女〉譯文。<sup>55</sup>這篇文章（“Women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最初刊於在倫敦出版的文藝政論刊物《時間和潮流》（*Time and Tide*）1925年5月號。倫敦的另一無政府主義月刊《自由》（*Freedom*）也曾轉載。接著，1927年1月，盧劍波在《新女性》刊登他重譯高德曼（在1917年曾出版於《新青年》）的〈結婚與戀愛〉一文。<sup>56</sup>或許是因盧劍波眼見當年的文言版譯文，未引發中國知識界對高德曼情愛論述的討論，因而擬為之爭取捲土重來的機

<sup>54</sup> 鳳子：〈女子解放與女子教育〉，《婦女雜誌》第10卷第11號（1924年11月），頁1662-1675。

<sup>55</sup> Emma Goldman 女士著，劍波譯：〈俄羅斯革命中的婦女〉，《新女性》第1卷第4號（1926年4月），頁253-260。

<sup>56</sup> 盧劍波對自己以白話文體再翻十年前袁震瀛譯過之文的解釋是，袁文「其文言譯述，不免以辭略意之處」，且「譯得太匆促」，因此「取而另譯」。Emma Goldman 著，劍波譯：〈結婚與戀愛〉，《新女性》第2卷第1號（1927年1月），頁81-92。另見盧劍波：〈序言〉，頁7。



會。之後，盧劍波再在同年三、四月號的《新女性》，連載〈愛瑪高德曼傳〉一文。此乃譯自捷克無政府主義者（亦曾為高德曼情人的）希波利特·哈缶（Hippolyte Havel, 1871-1950）在《無政府主義及其他論文》為高德曼寫的傳記式緒論。由盧劍波在該文末的「譯者附識」，可知他時至1927年，仍與人在西歐的高德曼保持書信聯繫。<sup>57</sup>

1927年8月，盧劍波集中選譯了高德曼關於女性及情愛的多篇論文，將標題定為《自由的女性》。此書於1927年8月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隔年即行再版。<sup>58</sup> 該譯文集的作品，除了〈俄羅斯革命的婦女〉一文，是高德曼基於1919年底返回俄國的親身經驗與觀察所撰之新作外，其餘皆選自她的《無政府主義及其他論文》。<sup>59</sup> 盧劍波在《自由的女性》「序言」中，清楚表明出版動機。他表示自五四以降，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可分為兩大陣營，一是愛倫凱與紀爾曼所代表的「婦女主義者」（「即包括主張女權運動和母權運動的人」，二是包括倍倍爾（August Bebel, 1840-1913）及山川菊榮（Yamakawa Kikue, 1890-1980）等在內的「一般左翼的社會主義者」（「即包括無政府主義者、工團主義者和馬克斯主義者」）。他將高德曼歸類於後者。他強調「前者如想從藉政治上的參政和立法以達到他們的目的，後者卻主張推翻了社會上一切制度的基礎」。劍波眼見關於前者的譯介頗豐，反觀革命派的婦女社會主義者相關介紹卻很有限，因此決定推介高德曼的作品給中國讀者。<sup>60</sup>

自1926年開始密集譯介高德曼的著作及生平的無政府主義者，

---

<sup>57</sup> Hippolyte Havel 著，盧劍波譯：〈愛瑪高德曼傳〉，《新女性》第2卷第3號（1927年3月），頁269-284；Hippolyte Havel 著，盧劍波譯：〈愛瑪高德曼傳（續）〉，《新女性》第2卷第4號（1927年4月），頁429-446。

<sup>58</sup> 此書有篇〈婦女解放的悲劇〉，為巴金所譯，其餘皆為盧劍波的譯作。見盧劍波：〈序言〉，頁5-8。

<sup>59</sup> 《自由的女性》收錄並翻譯的包括：〈愛瑪高德曼傳〉、〈結婚與戀愛〉、〈婦女參政論〉、〈賣淫論〉、〈清淨主義的偽善〉、〈婦女解放的悲劇〉、〈俄羅斯革命的婦女〉、〈近代戲劇論〉。

<sup>60</sup> 盧劍波：〈序言〉，頁5-6。

還包括當時以「李芾甘」之名投稿的巴金。巴金生自四川的地主家庭，卻與盧劍波、張履謙等出身較寒微的同志一般，對所處環境與社會現象有諸多不滿，苦思突破家族桎梏，投身社會革命。<sup>61</sup>1910年代末期，當巴金還在四川讀書時，即接觸過《實社自由錄》與《新青年》刊載的高德曼作品。在他日後的回憶錄中，形容自己閱讀高德曼的無政府主義論文時，「我的感動，我的喜悅，我的熱情……我真正找不出話來形容」。他並形容高德曼是「我的精神上的母親」。<sup>62</sup>巴金自1923年與三哥共赴上海後，與盧劍波及毛一波等川人同志過從甚密，共同為無政府理想而譯／著書立說，致力從事相關活動。1924年，他大量參考高德曼關於無政府主義或評論俄國革命等著作，為《民鐘》及《時事新報》的「學燈副刊」等撰稿。<sup>63</sup>1925年，剛從南京東南大學附中畢業的巴金，在秦抱朴的介紹下，開始與高德曼通信。<sup>64</sup>他對高德曼作品的中文翻譯，即屬他倆書信往來的間接結果。<sup>65</sup>巴金眼見盧劍波將高德曼的〈俄羅斯革命中的婦女〉譯文刊在《新女性》，便隨即在同刊物投上一篇〈俄羅斯革命中的婦女補〉，以更新高德曼文中所提俄羅斯革命女性至1926年的情況。<sup>66</sup>同年7月，巴金再在《新女性》發表高德曼的〈婦女解放的悲劇〉譯文。<sup>67</sup>1927年初遠赴巴黎求學，之後只在《新女性》1928年四月號，發表過一

<sup>61</sup> 巴金：〈家庭的環境〉，《巴金全集》第12卷，頁380-402。

<sup>62</sup> 巴金：《巴金自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5年），頁76-78。

<sup>63</sup> 巴金並以芾甘之名，在《民鐘》發表高德曼的〈瑪麗亞司皮利多諾瓦的迫害事件〉譯文。見Goldman著，芾甘譯：〈瑪麗亞司皮利多諾瓦的迫害事件〉，《民鐘》第1卷第10期（1925年1月），頁21-24。巴金的作品中有關高德曼者、或他與高德曼的交流，見唐金海、張曉雲：《巴金的一個世紀》（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04年），頁49-52、55、58、61、67。

<sup>64</sup> 秦抱朴：〈回憶早年留俄及與高德曼相識的經過〉，手抄本。

<sup>65</sup> 高德曼女士（Miss Emma Goldman）著，李芾甘譯：〈婦女解放的悲劇〉，《新女性》第1卷第7號（1926年7月），頁520-521。

<sup>66</sup> 李芾甘：〈俄羅斯革命中的婦女補〉，《新女性》第1卷第4號（1926年4月），頁261-264。

<sup>67</sup> 高德曼女士著，李芾甘譯：〈婦女解放的悲劇〉，頁511-521。



篇高德曼所著之〈斯特林堡底三本婦女問題劇〉譯文。<sup>68</sup>

此外，同是川籍無政府主義同志的毛一波，也加入劍波與芾甘的行列，共同宣揚高德曼的情愛論述。1926年10月，毛一波以「尹文彬」的筆名，在《新女性》寫了篇關於《高曼女士文集》的短書評。這本文集收錄當時已成為廣東大學教授的袁震瀛過去十年間翻譯的十篇高德曼作品，其中五篇涉及政治與宗教問題，餘則與婦女及情愛問題有關。盧劍波在1927年兼以專文及專書雙重方式出版的高德曼譯作，幾乎都被袁震瀛譯過。然而，盧劍波與毛一波不約而同地暗示袁氏的文言譯筆，是這些譯作未能普及於中國之因。盧劍波以白話文文體，全盤重譯高德曼有關婦女與情愛課題的論文，並宣稱曾與袁文及另一西班牙文版本互相參照過，藉此強調自己的譯文品質。<sup>69</sup>毛一波簡要介紹了那五篇討論婦女及情愛問題的論文要旨，強調高德曼反對婚制與女子貞操觀，不贊成女子參政運動與母性保護運動，主張自由戀愛、自由性交與全面的社會革命。<sup>70</sup>

值得注意的是，服膺高德曼思想者，不只無政府主義男性；盧劍波的愛人同志鄧天喬，也曾言行合一地響應高德曼的自由戀愛論。鄧天喬同是來自四川的無政府主義者，曾撰文出版一些與婦女解放有關的論著，甚至也如劍波、謙弟與一波同樣，在《新女性》發表過多篇文章。<sup>71</sup>從鄧天喬的諸多論著內容，可判知她頗熟悉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等外來學理，對國內政治與經濟情勢，也有相當掌握，並深

<sup>68</sup> 高德曼女士著，李芾甘譯：〈斯特林堡底三本婦女問題劇〉，《新女性》第3卷第4號（1928年4月），頁431-454。

<sup>69</sup> Emma Goldman 著，劍波譯：〈結婚與戀愛〉，頁81。

<sup>70</sup> 尹文彬：〈高曼女士文集〉，《新女性》第1卷第10號（1926年10月），頁754-756。

<sup>71</sup> Rachel Hui-Chi Hsu, "Rebellious Yet Confined: Women Dissenters on Love and Sexual Morality in the *Ladies' Journal* and the *New Woman*," in *A Space of Their Own: Women and the Periodical Press in China's Long Twentieth Century*, eds. Joan Judge, Barbara Mittler, and Michel Hock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158-175.

切關懷婦女解放議題。<sup>72</sup> 鄧天喬曾為盧劍波所編的《自由的女性》撰寫書評，稱道「高德曼女士是婦女的先覺者，是婦女革命的勇士」。她認同高德曼將婚姻等同於賣淫，並視戀愛為「兩性的自由的合理的結合」。她也高度讚美高德曼不只抨擊舊社會體制、道德家與教士們聯手壓迫個人的自由表達，也洞悉婦女投票權並非真正解放婦女之道。<sup>73</sup> 另外，鄧天喬在1927年1月號的《新女性》上，以寫給主編章錫琛一封公開信的方式，說明自己與盧劍波「沒有經過結婚儀式」的結合關係。她澄清自己主張兩性的自由戀愛，反對「舊式契約式的結婚」。她並表示，由盧劍波所翻譯的高德曼〈戀愛與結婚〉一文，「便可以代表我的意思」。<sup>74</sup> 相較於當時許多與黨員同志私下實踐同居卻未公開關係的中共女青年，鄧天喬在自由戀愛上表現的言行合一，願意承擔大眾輿論可能的側目甚至指責，可謂勇氣十足。

這場出現於1920年代後半期的高德曼譯述潮，與前述五四階段的特色相較，有若干重要的區別：一、譯介者不僅皆為無政府主義者，且幾清一色為四川籍、不與其他任何政黨妥協合作的激進知青。二、此時這些譯介者選擇發表作品的園地，並非無政府主義機關刊物，而是以婦女問題為主的大眾雜誌，如《新女性》月刊，以便使其思想更大程度地接觸大眾，發揮影響力。三、這波譯介的文本主題，幾乎全集中在高德曼對婦女解放、自由戀愛與情慾自主的論述上，與前階段大半偏重她有關無政府主義課題（如批判政府與黷武主義、主張社會革命等）的作品之譯介，呈現鮮明對比。在盧劍波與巴金等人的翻譯與宣揚下，高德曼的情愛論述，終得以較完整被介紹到中國讀者面前，並透過《新女性》這類大眾刊物，在上海文化界獲得某種討

<sup>72</sup> 關於天喬引用高德曼著作之文，見天喬：〈論婦女解放與遺產繼承權運動〉，收於一波、劍波、謙弟：《婦女問題雜論》（上海：出版合作社，1927年），頁147-154。

<sup>73</sup> 天喬：〈讀「自由的女性」〉，收於天喬、劍波：《婦女解放與性愛》（上海：泰東圖書局，1928年），頁201-205。

<sup>74</sup> 天喬：〈我們的結合〉，《新女性》第2卷第1號（1927年1月），頁125-126。

論與對話空間。這群左翼激進青年，從接受與省思高德曼的性激進主義思想出發，更進而發現自己的追求與想望，演繹出具有中國時代特色的無政府性愛論述。

#### 四、從戀愛中進一步解放：

#### 激進無政府主義者的非戀愛論述

誠如袁震瀛日後的憶述，無政府主義「主張無強權、無宗教、無姓氏、無民族、無婚姻、無家庭、提倡自由戀愛等」。<sup>75</sup> 專研中國無政府主義史的顧德琳也指出，1920年代前後的中國社會，「很多人使用『自由戀愛』這個流行用語，卻很少人知道它的無政府女性主義的背景」。<sup>76</sup> 不過，西方無政府共產主義陣營，雖不乏支持婦女解放與自由戀愛者，卻仍視社會革命與經濟解放為其運動主軸。像高德曼如此重視其性激進主義的訴求，可謂異類。<sup>77</sup> 毛一波曾撰文簡介克魯泡特金的婦女觀，強調後者「是人道主義者，他是非常之尊視女性的」，並引述其《麵包略取》（或譯《麵包與自由》〔*The Conquest of Bread*〕）裡的一段話：「真正的婦女解放，是在使婦女免除廚房及洗衣服等工作，而使其改造家政，使其有餘暇參加社交的生活和從事於小孩的養育。」或許出於對克氏的無限景仰，使毛一波不假思索地在

<sup>75</sup> 袁振英：〈袁振英的回憶〉，收於葛懋春、蔣俊、李興芝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下，頁971-981。

<sup>76</sup> 顧德琳著，洪靜宜譯：〈周易行難：中國無政府主義的婦女性別論述及其落實限制〉，頁62-86。

<sup>77</sup> 在相當程度上，多數的中國無政府共產主義者，也呼應著克魯泡特金的立場，即支持婦女解放與兩性平等，但仍以社會經濟解放為重。此種論述比重，可見諸《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所附的〈無政府主義書刊名錄〉，其中關於兩性或女性的書籍並不多。見〈無政府主義書刊名錄〉，收於葛懋春、蔣俊、李興芝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下，頁1069-1087。

這段話之後，表示「這個意見，真是十分透關」。<sup>78</sup> 實則，克氏的行文隱含著男性無政府主義看待婦女問題的局限性，亦即——類似多數社會主義者一般——將社會革命或無產階級的解放，置於婦女解放之前，並基於男女天性有別的認知，主張男女各司其「天職」。<sup>79</sup> 高德曼的言行表現，則致力於抗拒無政府主義這種男性本位的主流意識形態。雖然中外各地的無政府主義團體，向來是男性成員居多，且以無產大眾為優先關照對象，高德曼仍持續不懈地企圖將性別議題主流化。她之所以要求巴金為她翻譯〈婦女解放的悲劇〉等文，並樂見盧劍波重譯〈結婚與戀愛〉以及編譯《自由的女性》文集，都是希望婦女解放與情慾自由的課題能受到各國重視，共同促成社會私領域的根本改變。<sup>80</sup> 高德曼或許會預期她在這方面的文字會感動中國青年，但她應該沒料到，就在這群譯介與宣揚她自由戀愛的無政府後輩當中，竟發展出比她思想更激進的「非戀愛」論述。這幾位川籍無政府主義青年捨愛就性的論述，剖析了近代情愛觀的系譜演變。考察此一「非戀愛」理念，可了解他們如何在置身時代困境之際，透過援用進而揚棄高德曼的情愛思想，策略性地闡揚具社會進化意涵的無政府主義精神。本節將介紹「非戀愛」的主要觀點，以論證這群無政府主義青年，如何透過重塑戀愛與性慾及社會的關係，發揚性交自由與人類大愛的無政府精神。此外，本節也會藉由對照中共黨員男女身體力行的「一杯水主義」式自由性交論，來闡釋「非戀愛」的論述本質。

無政府主義者的「非戀愛」，從揭櫫此一理論的張履謙之文章觀之，首在將矛頭指向愛倫凱式的「戀愛自由」觀。1927年春，盧劍

<sup>78</sup> 一波：〈克魯泡特金的婦女觀〉，收入一波、劍波、謙弟：《婦女問題雜論》，頁16-20。

<sup>79</sup> Margaret S. Marsh, *Anarchist Women, 1870-1920*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9-20, 54, 166.

<sup>80</sup> 從高德曼承允為盧劍波編譯的《自由的女性》文集寫序、並寄一張近照，可知高德曼很樂見此論文集在中國出版。可惜，據盧劍波所言，高德曼當時急赴加拿大，因而來不及在出版前寄上。見盧劍波：〈序言〉，頁8。

波的友人同志張履謙以「謙弟」的筆名，先在張競生主編的《新文化》發表〈論「戀愛論」〉一文，後於章錫琛主編的《新女性》發表〈戀愛貞操新論〉。他以這兩篇文章，為「非戀愛論」奠下言說基礎。謙弟顯然熟悉高德曼的情愛論述，並曾引用高德曼的言論，來說明像她那樣的自由戀愛論者，如何非難婚姻制度的種種弊病。<sup>81</sup>但謙弟並不止步於對婚姻制度的棄絕，他更希望明確批判當時在上海報刊界頗受歡迎的「戀愛貞操」與「靈肉一致」觀念。曾任《婦女雜誌》與《新女性》主編的章錫琛，對戀愛下過此定義：「所謂戀愛，是一男一女，關於性的行為，因了求實現理想化的性慾之合意而生的和合。」<sup>82</sup>章進一步指出：「戀愛的本身就是貞操，因為戀愛本來是靈肉一致的：在一方面，對於有靈而無肉的不應認為戀愛的完成；在他方面，真正戀愛也決不能有肉而無靈。所以我們倘使承認了男女間的性交必須以摯密的愛好為原則，則在有戀愛的戀人同志的各方，自然不會對於自己戀人以外無愛情的異性發生肉的關係。這便是我所以主張戀愛貞操一致說。」<sup>83</sup>謙弟將這種提倡戀愛自由，且為戀愛保有對愛人的貞操之主張，稱之為「戀愛貞操新論」。他力圖駁斥的，正是這種認定戀愛雙方的靈魂與肉體都應緊密交流，並將戀愛與（即便是自發對等的）貞操劃一的所謂戀愛自由觀。

謙弟反對戀愛的論點，主要有二：一是戀愛無關乎兩性的性結合。二是戀愛導致反社會行為。就第一點，謙弟指出兩性之間的關係，有因客觀環境允許或主觀個性相投使然而產生的「親密情感」，以及出於人類本能而有的「生理需求」。此二者，前者即「愛」，後者

<sup>81</sup> 謙弟：〈近代的兩性結合〉，《新女性》第3卷第11號（1928年11月），頁1258-1262；謙弟：〈我所認為新女子者〉，收於一波、劍波、謙弟：《婦女問題雜論》，頁174-193。

<sup>82</sup> 章錫琛：〈結婚與戀愛的定義〉，《婦女雜誌》第9卷第6號（1923年6月），頁119。

<sup>83</sup> 章錫琛：〈我的戀愛貞操觀——寫在謙弟劍波兩君的文後〉，《新女性》第2卷第5號（1927年5月），頁533-536。

為「性慾」；他認為這兩者之間，無甚關聯。他說明一男一女之間產生的愛，無異於友愛與親子愛等人與人之間發展出的密切情感交流。對他而言，異性之間、同性之間或不同世代之間的相愛，只有程度之差，無本質之別。另一方面，他認定男女性的結合，純粹出於生理的需求與相合，而非如戀愛自由論者所謂是由精神相戀而滋生引導的。他據此反對章錫琛等人的「情感性趣說」（即主張與情感相契的異性性交，樂趣較多），因為此說可能誤使人們以為只要與異性產生情感，便非得性交不可，而演變成「情感強姦論」。<sup>84</sup> 換言之，謙弟強調兩性之間的交合，愛是一回事，性又是另一回事；將男女之愛以「戀愛」專門稱之，不但不必要，而且誤導了人們對兩性結合的理解。他拆解兩性間被戀愛自由論者認定為緊密相連的戀愛與性慾，一面把戀愛和友愛等情感同質化為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係，另一面讓性慾回歸為人類的原始生理慾望。

至於第二點，謙弟基於戀愛自由論者的詮釋與社會眾人的實踐結果，表示戀愛具有占有慾與拒他性，有違無政府主義者宣揚的個性解放、公共美德、集體大愛與互助精神，因而不利於社會與個人的健全發展。<sup>85</sup> 他指出：「人類的社會，不是為兩性的戀愛而組織的，更不是為兩性（指他和她個人）的性生活而組織，乃是為全人類的安樂而組織，為保證全人類的生存而組織的。」「是以我們站在社會方面說來，為了社會的組織，日臻完善計，我們應當消滅這反社會的兩性戀愛，而實現人類愛。」<sup>86</sup> 他相信，唯有將男女兩性從愛倫凱式的「戀愛貞操」觀中解放，使男女情感關係成為具有普世性、無私性質的其中一種愛，並使男女性關係以彼此生理條件合適與否為其交合的唯一原則，方能落實兼具個人自由與社會共融的目標。此番非戀愛論，明

<sup>84</sup> 謙弟：〈非戀愛與戀愛〉，《新女性》第3卷第5號（1928年5月），頁501-525。

<sup>85</sup> 謙弟：〈戀愛貞操新論〉，《新女性》第2卷第5號（1927年5月），頁525-531。

<sup>86</sup> 謙弟：〈非戀愛與戀愛〉，頁501-525。



顯抵觸《新女性》月刊主編章錫琛自1920年代初便熱切提倡的戀愛神聖觀，進而引發該刊從1927到1928年底，斷續地進行關於「非戀愛論」與「(非非)戀愛論」的筆戰。<sup>87</sup>

謙弟及其同志例如毛一波的非戀愛立論，企圖在生物學與醫學等科學基礎上，提倡符合其無政府主義思維的性交自由與人類愛。毛一波特別針對當時戀愛自由論者主張戀愛是「友誼和性慾的集合體」，提出批判性回應：「友誼是一種人與人間的親近的行為，戀愛則是一種幻想。戀愛這幻想，是存在人們腦中的一種觀念，一個玄學。我們不能稱之為友誼，亦不能稱之為性交。」<sup>88</sup>毛一波反對將男女之間的愛特殊化，主張人類只存在一種（雖有差等的）愛。他表示，異性與同性彼此之間，都可以「因了信仰、性情、事業等等之相投合而發生最密切最親熱的關係」。他不贊同「把一個同等程度的愛的關係，在兩性間則稱為戀愛，在同性間則稱為友誼」，因為這兩種愛的本質是相同的。<sup>89</sup>毛一波呼應謙弟的論點，指責戀愛助長了人的「忌妒」、「偏於享樂」、「情殺」以及「不顧人類愛」，並引用生理學的研究成果，指出性慾「並沒有包含著性愛的成份」，只是純然的生理衝動。<sup>90</sup>他的「非戀愛」論述，一方面批評章錫琛等人將性慾精神化，以求將性慾從戀愛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達到性交自由，另一方面卸除戀愛特殊化（亦即特別用「戀愛」來形容兩性間的密切情感）的不當面貌，以發揚具無政府主義精神的人類普世愛。

由上可知，非戀愛論的矛頭主要是愛倫凱式的戀愛自由論，而非高德曼的自由戀愛說。但這些作者們在論述推展的過程中，卻因非難戀愛的實踐，顛覆戀愛的意義，進而否定戀愛的價值，而連他們原先

<sup>87</sup> 許慧琦：〈1920年代的戀愛與新性道德論述及其演變〉，頁29-92。

<sup>88</sup> 一波：〈非戀愛的又一聲——質章錫琛先生——〉，《新女性》第4卷第3號（1929年3月1日），頁329-337。

<sup>89</sup> 毛一波：〈再論性愛與友誼〉，《新女性》第3卷第11號（1928年11月），頁1248-1258。

<sup>90</sup> 一波：〈我的戀愛觀〉，《新女性》第2卷第7號（1927年7月），頁718。

所認同高德曼的自由戀愛思想，也一併揚棄了。這種對愛與慾的思想辯證，最清楚地展現在盧劍波的著述中。盧劍波對於謙弟與一波同志的非戀愛論見，做了相當認真、徹底且反覆的思索，不惜以今日之我，挑戰昨日之我。在謙弟提出非戀愛論之初，盧劍波便於1927年夏撰文表示：「我和謙弟一樣是安那其（按：即無政府）主義者，是唯物論者，是主張性交自由者，是倡『人類愛』者。」但「在我的認識還未破碎之先，究竟不敢盲從」。<sup>91</sup> 此處所謂的「認識」，是指他向來承認戀愛與性慾之間的關係，以及戀愛存在的必要性。那時，他仍肯定高德曼所主張的自由戀愛與自由母性。到1928年春，劍波原先依循高德曼的思想出現轉變，「漸漸地贊成了非戀愛的主張」，且「打算追逐著他（按：指謙弟）而有所闡發」。他同時在《世界月刊》、《婦女戰線》與《文化戰線》等刊物上，發表了數篇短文。此乃他對非戀愛論的第二種態度，即由原先的質疑，逐漸轉為接受。但這呼應謙弟論見的時日不長，到1928年7月，臥病中的盧劍波，再於《新女性》發表〈性愛與友誼〉一文，解釋自己還是未能全盤否認性愛存在，或忽略性愛難以被廢除的事實。<sup>92</sup> 很快地，不到一兩個月的時間，盧劍波的論述立場又再丕變；他在1928年8月號的《新女性》發表的〈談「性」〉一文，可謂挑戰或超越高德曼愛慾思想的第一步。此文也是他闡明中國無政府主義者建構新性愛論述的思想意義與革命價值之作。<sup>93</sup> 從盧劍波的言論演變可知。他對性愛與性慾及二者關聯的論證，先接受並發揚了高德曼追求自由的熱情，繼而質疑與放棄高德曼崇尚戀愛的執著。盧劍波並非全盤否定兩性之間可能存在愛情，但他反對戀愛論者的靈肉一致說，與以愛為基礎的新性道德。因為，只要戀愛與性慾被捆綁在一起，或堅持有愛才能有性的話，性

<sup>91</sup> 劍波：〈非戀愛與戀愛貞操〉，《新女性》第2卷第8號（1927年8月），頁835-847。

<sup>92</sup> 劍波：〈性愛與友誼〉，《新女性》第3卷第7號（1928年7月），頁740-741。

<sup>93</sup> 劍波：〈談「性」〉，《新女性》第3卷第8號（1928年8月），頁868-876。



慾便仍受戀愛的駕馭與限制，無法自由。此外，他也強調性慾與戀愛即便無法一刀兩斷，但性慾絕非戀愛的從屬物，靈並不比肉優越。

盧劍波與謙弟等人，在抵抗戀愛自由論者「重靈輕肉」的觀點以解放個人性慾之際，嘗試在高德曼等前輩的論述基礎上，進一步貫徹無政府主義的精神真諦。從無政府主義向來主張個人自由與人類解放的宗旨觀之，「性」確為最攸關個人生理需求與人類發展存續的關鍵。無論是戀愛自由者的詮釋，抑或戀愛在社會上的實踐，都驅使這些中國無政府主義青年無法如高德曼一般，提倡理想的戀愛以由此獲得個性解放，反而自覺必須從戀愛中拯救性慾與人類愛。若說，高德曼的〈結婚與戀愛〉一文，主在歌頌戀愛的偉大，鄙夷箝制人性（尤其婦女）的婚姻，那麼，提出非戀愛論的謙弟，已將論述重點挪到戀愛自身的弊病，並解構愛與性之間的勾連。盧劍波的言論態度轉變，便出於針對戀愛與性慾之間的關係，所做的辯證思索。到寫作〈談「性」〉一文之時，他有意識地透過對「自由戀愛」的省思，論證「性」不應受「愛」束縛。無政府主義者要剷除的，不只是作為「法奴隸制」的婚姻，還有作為「性的奴隸制」，帶有神秘、占有與自私特性的戀愛。如此，才能真正允許兩性追尋及滿足對愛與慾的各自需求。<sup>94</sup>

對此時的盧劍波而言，自由性交比自由戀愛，更能彰顯無政府主義與社會進化原則的真諦。他強調他們主張的自由性交理念，乃符合無政府主義理想中「將來的政治經濟新原則」。他也清楚表達，「自由性交」是除了一般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解放訴求（如經濟、階級平等）之外，唯一能解放新男女青年之道。劍波思想發展到此處，終於與他歸類為「自由戀愛者」的高德曼，出現立場分歧：

我說，自由戀愛者簡直是個心物二元論者（雖然他們有的要否認），是到性解放的中途而徬徨者，是帶有性的神秘性，和

<sup>94</sup> 劍波：〈談「性」〉，頁875。

清淨主義的遺傳者。他們不知道「完全依了性（先認明什麼是性！）的需要性的利益，沒有高尚（？）純潔（？）的戀愛（？）而住在一起，只有肉的結合」不是可恥的行為，是超道德的價值判斷的行為。無政府主義者的阿爾伯氏，高德曼氏都在其「性革命」一邊，顯示其徬徨的滿足了。<sup>95</sup>

言下之意，盧劍波至此認定，高德曼這樣的「自由戀愛者」，就實踐無政府主義的精神而言，未能突破靈肉有別且靈高於肉的二元迷思，使性慾受到虛無飄渺的戀愛所局限，無法真正獲得解放。類似的言論，尚可見諸他所編《戀愛破滅論》（1928）的〈前言〉，及他自稱以「站在社會進展的最前線上的走卒」之身分所撰的《社會的價值與變革》（1929）一書。這些主張「非戀愛」的無政府知青們，不約而同地強調當時中國社會上不乏可見的戀愛「悲劇」，對性的諸多壓抑與撻伐。向培良（1905-1961）便在其收錄於《戀愛破滅論》的同標題論文裡，把高德曼曾截然劃分開的「戀愛」與「婚姻」，歸結為同具壓迫本質的人性解放大敵。他表示，中國的戀愛自由論者，根本只是主張結婚，但以戀愛作為序曲，去維繫由（仍舊壓迫著女性與人格的）婚姻立基的家庭。向培良寫道：「從性底要求出發，或者，甚至於完全沒有性底要求，而沉入幻想裏；於是消失了自我，消失了對手方的人格，消失了人類，消失了現實，而且壓迫了性，這樣就是戀愛。」<sup>96</sup> 向培良與《戀愛破滅論》另一位作者高長虹（1898-1954?）對戀愛的抨擊，都秉持著與謙弟及盧劍波類似的無政府思維，亦即強調戀愛不只壓抑性慾，也有礙人類愛的發展。

劍波在《戀愛破滅論》的〈前言〉中，將他們喊出的非戀愛呼聲，詮釋成「一種空前的性關係的革命，和現時代所要求的產業的所有關係的革命，是相一致的。必然的，牠將影響到將來男女間的關

<sup>95</sup> 劍波：〈談「性」〉，頁876。

<sup>96</sup> 培良：〈戀愛破滅論〉，收於劍波編：《戀愛破滅論》（上海：泰東圖書局，1928年），頁1-40。

係，而且毀滅了過去的一切性的憧憬，禁忌，和壓迫。牠將跟著社會的革命而大膽地完成人類的解放之一部分功能」。<sup>97</sup> 他認為，性解放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仍多止步於小資產階級式的改良主張，在破壞舊制度與建設新理想兩方面，都屬「畸形的革命進展」。如今，不只愛倫凱等人的戀愛論應宣告終結，「便是柏柏爾以及高德曼等的膽大的性革命主張，也不能不因為時代潮流中人類要求解放的範圍愈擴大而有所闡揚」。<sup>98</sup> 在《社會的價值與變革》一書中，盧劍波進而將原本被他分歸為改革與革命思想陣營的愛倫凱與高德曼，劃為同類，指她們都無法正視與接受絕對的性自由。<sup>99</sup> 盧劍波自然瞭解愛倫凱的戀愛自由（或謂戀愛結婚）說，與高德曼的自由戀愛／性愛觀，在立論與主張上都相當不同。但依他當時所處的思想光譜位置觀之，不論戀愛自由或自由性愛，都應在社會進化的辯證歷程中被揚棄，代之以真正解放個人的性交自由。

應予注意的是，盧劍波及其無政府同志在北伐前後發表對「性要求完全解放的第一宣言」的「非戀愛論」，與中共青年男女所服膺的「一杯水主義」，有著重要的本質差異。不可否認，國際與中國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在1920年代皆趨向沒落。在學生與工人群中吸取黨員、積極發展的中國共產黨，其批判傳統舊俗、主張社會與個人解放的激進表現，取代了五四時期在青年群中曾有高度吸引力的無政府主義。<sup>100</sup> 然而，無政府主義青年在1920年代中後期提倡的非戀愛論，是一種面對外來思潮的辯證思考之後的創發性論述；其不論在理論思維或行為實踐上，都有別於中共青年的一杯水主義。首先，就論述而言，非戀愛論者主要出於捍衛個人自然需求與維護社會情感，欲從戀

<sup>97</sup> 劍波：〈前言〉，收於劍波編：《戀愛破滅論》，頁1-3。

<sup>98</sup> 劍波：〈前言〉，頁2。

<sup>99</sup> 盧劍波：《社會的價值與變革》（上海：啟智書局，1929年），頁4。

<sup>100</sup> Dirlik, *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7-247; Wen-hsin Yeh, *Provincial Passages: Culture, Space,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229-260.

愛中拯救性交自由與人類愛。中共的一杯水主義者則從為黨、為革命、為確立無產階級性出發，棄絕其視為浪費時間金錢且充斥小布爾喬爾色彩的戀愛。<sup>101</sup> 雖然多位非戀愛論者也將戀愛視為（小）資產階級特有的表現，但他們主要著力之處，在於思索個人與社會之間應如何互動，情愛與性慾應如何發展，才能真正達到兼具個體與集體解放意涵的無政府主義理想境界。其次，從實踐來看，無政府主義青年提出「非戀愛論」，意在透過對愛慾關聯的深刻省思，來闡釋其無政府主義理念，而非藉此遂行自由性交。<sup>102</sup> 相對地，由諸如中共早期革命家鄭超麟（1901-1998）在回憶錄中的生動描繪可知，中共男女同居的自由性愛生活，多少反映出其擁抱的「一杯水主義」，更多是便宜行事的實踐，缺乏真正具思想性的論述與理想。中共黨員複雜糾葛，甚至引發諸多政治內鬥的三／多角縱情，對照當時巴金等人強調同情情誼勝過男女戀情等禁慾表現，更呈現出無政府主義者是「為人類愛而反戀愛」，而中共黨員則是「為性自由而反戀愛」的言行差異。

從對高德曼的譯介到「非戀愛」的論述過程，我們看到一小群思想激進而充滿革命熱忱的中國無政府青年，除繼續在公領域推動與國共對峙的社會革命之外，也到私領域另闢革命「性」言論戰場，以徹底發揚純粹無政府主義的精髓。劍波等人並非沒有認知到，這般展現性自由與人類愛的烏托邦境界，與當時中國社會發展實況有著巨大落差。<sup>103</sup> 他們反覆申明，此一反戀愛的自由性交主張，是為了完善地配合（由政治經濟事務主導之）公領域的社會革命結果，以求人類未來在公、私範疇，都能落實真正的自由與解放。從歷史的後見之明可

<sup>101</sup> 陳碧蘭：《我的回憶》（香港：十月書屋，1994年），頁130-137。

<sup>102</sup> 顧德琳便曾表示，1920年代的中國無政府主義者，相當重視道德，且其中不少人，包括巴金，對感情之事並不熱衷，甚至有禁慾傾向。顧德琳著，洪靜宜譯：《知易行難：中國無政府主義的婦女性別論述及其落實限制》，頁74-75。

<sup>103</sup> 劍波：《論性愛與其將來的轉變》，《新女性》第3卷第12號（1928年12月），頁1357。

知，他們念茲在茲地視為符合科學進化原則的非戀愛思想，未能如願以償。然而，這套兼具脫離現實的高度前衛性，與凸顯無政府主義烏托邦思想特質的新性愛論述，實鮮明地展現他們突破公領域的革命框架，於個人愛慾的私領域範疇，深耕無政府理想的無畏嘗試。此一化公於私、以求由私入公的非戀愛思維，在國共領銜從事政黨革命之際，不啻為另闢蹊徑的另類革命論調。

## 五、高德曼的消失，女性的缺席：

### 非戀愛論的性別分析

研究近代中國無政府主義史的學者，多承認何震那種高揚「女子復仇論」的無政府女性主義，如空谷足音，後不復見。<sup>104</sup> 雖然五四以來，許多無政府主義知青從反對權威、挑戰傳統與兩性平等的意識形態出發，宣揚反家庭、反婚姻與自由戀愛，但直到1920年代鄧天喬出現之前，鮮少可見女性無政府主義者的著述。「非戀愛」論堪謂民國時期的中國無政府主義者，將婦女解放融入對性解放與人類普世愛的追求所闡述的重要創見。微妙的是，在「非戀愛」的闡述及與反對者的辯論過程中，不只高德曼被消音，連鄧天喬也缺席。換言之，主張非戀愛論者，清一色是激進男性知青。這意味著什麼？本文最後一部分，將對非戀愛論進行性別分析，以揭示北伐前後無政府主義者性愛論述的意義，及其局限。

雖然謙弟與盧劍波等人在當時中國的社會文化氛圍中，企圖以性交自由與人類愛取代高德曼推崇為實現個性解放的自由戀愛，但他們

---

<sup>104</sup> 劉慧英：〈從女權主義到無政府主義——何震的隱現與《天義》的變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年第2期，頁194-216；Lydia H. Liu, Rebecca E. Karl, and Dorothy Ko, eds., *The Birth of Chinese Feminism: Essential Texts in Transnational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1-52.

並未揚棄她念茲在茲的婦女解放。盧劍波曾透過〈談「性」〉一文，強調性關係對社會解放與婦女解放的重要性，以釐清他與同志們談論性關係、界定性觀念與建構新性愛論述的動機。他還在標題為〈女性的解放〉文中，引述高德曼對婦女解放的詮釋：「什麼是婦女解放的呢？高德曼說得好：『解放的目的，是要使女子成為一個真正的人。她的判斷力和活動力應該達到完全的地步，一切人造的障礙都應該毀滅掉，並且向較大的自由去的道路上的千百年來壓迫和奴役的迹印都應該洗清的。』」<sup>105</sup>非戀愛論者，都沒有忽略中國女性所遭受的多重壓迫：他們不只強調打破戀愛專制，才能解放深受婚姻、貞操、家庭與男子壓制的女子，也基於兩性平等與個人獨立的原則，呼籲女性應自己解放自己。<sup>106</sup>但由於發出獨立解放呼聲的女性仍極有限，因此這些無政府主義男性知青自認責無旁貸地為女性代言。

近代中國的女性問題，由男性加以代言時，常出現的情形，便是將婦女解放納入社會或國族解放的大業中，以圖共同達成；非戀愛論者亦不例外。毛一波曾如此界定在社會革命中，人類解放與婦女解放的從屬關係：「劍波，謙弟和我，都是贊成社會革命的人；我們常把解放全人類的事，比解放婦女的事更看得重要。……但我們不是說，把婦女解放的事除外，而是把婦女解放的事包含在解放全人類的中間。因為我們相信社會革命，乃在於解放全人類，而這全人類之中，自然有了一大部分是屬於婦女的。」<sup>107</sup>此番論調，與當時國共領導成員對婦女問題抱持的立場，並無二致。<sup>108</sup>亦即，他們都將婦女解放的訴求，置於更高遠宏大的民族解放、社會解放或人類解放等理想之

<sup>105</sup> 劍波：〈女性的解放〉，收於天喬、劍波：《婦女解放與性愛》，頁62-83。

<sup>106</sup> 例見培良：〈戀愛破滅論〉，收於劍波編：《戀愛破滅論》，頁1-40；劍波：〈男女鬥爭與男女互助〉，收於天喬、劍波：《新婦女的解放》（上海：泰東書局，1928年），頁64-69。

<sup>107</sup> 一波：〈序〉，收於一波、劍波、謙弟：《婦女問題雜論》，頁1。

<sup>108</sup> 例見何香凝：〈國民革命是婦女唯一的生存〉，收於廣東省檔案館、廣東婦女運動歷史資料編纂委員會編：《廣東婦女運動史料（1924-1927）》（廣州：廣東省檔案館，1983年），頁2-4。



下：惟有完成後者，方得實踐前者。從性別分析的角度觀之，這是一種以男性的目標代表全體人類宗旨的性別化（gendered）論述，正如從種族分析的視角觀之，白人總是以自身為放諸四海的人類代表，而將其他種族視為具他者特質的「有色人種」。<sup>109</sup> 此種以男性代表人性來闡述兩性問題的邏輯，相當普遍地出現在如靄理士這類男性性學家，以性解放含括（乃至取代）婦女解放的論述中。<sup>110</sup>

從這般忽視兩性差異的男性思維出發，有助於我們理解非戀愛論者未注意生育與墮胎這類獨屬女性的議題之因。這群提出新性愛論述的無政府男性知青，主要著眼於無性別特質之分的個人與社會之關聯。大凡因生理與社會各種因素，所導致女性有別於男性的生理功能或特殊需求，都不是這群年輕男性論述或關注的重點。他們只著重論辯個人的性慾需求，如何應在人類愛被兼顧的情況下，掙脫出傳統禮教、婚姻律法、家族體制、甚至戀愛私有制等束縛，以求解放。尤有甚者，他們似乎只在意兩性的「平等」，以致於在性自由這方面，謙弟有如下論點：「我們應當知道，兩性發生性的關係，在性的方面只要不是誰的強姦，那便沒有什麼罪的。如果說是與女性發生了性交後不負責任，不專愛便是遊戲女性，那又何嘗不可以說：女性是在遊戲男性呢？」<sup>111</sup> 姑不論在性行為及其後果方面，是否真能達到兩性平等，至少在節育觀念與避孕措施都不盡普及的1920年代，當一對男女發生性行為之後，女方必須承受的輿論壓力與身心結果，泰半較男性更沉重。上述謙弟這段話，出於他因「非戀愛論」被反對者指控玩弄女性，而做的自我思想辯護。他並未思及，女性異於男性的生理特徵與社會因素，以及受限於醫藥技術、衛生知識與道德價值觀，都使她們的情慾自主無法如男性那般，較可能說到就做到。雖然謙弟亦曾

<sup>109</sup> Abby L. Ferber, *White Man Falling: Race, Gender, and White Supremacy* (Bost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9).

<sup>110</sup> Margaret Jackson, *The Real Facts of Life: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c1850-1940*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1994), 106-128.

<sup>111</sup> 謙弟：〈非戀愛與其他〉，《新女性》第3卷第11號（1928年11月），頁1247。

提及「非戀愛論者，相信女性的解放，除經濟方面而外，是要在家庭制的破滅與兒童公育這兩項能成為事實之後」，<sup>112</sup>但兒童公育，並不是解決女性獨特問題的萬靈丹。

回過頭來看在非戀愛論展演的過程中，被揚棄而逐漸消失的高德曼；她的自由戀愛與性慾自主理念，便明顯地考量了女性的特質與需求。19世紀以降的美國主流女性主義者，多半只贊同「自願母親身分」(voluntary motherhood，即女性有權選擇何時受孕)，卻反對節育措施，且對性慾持保守態度。<sup>113</sup>言下之意，生育是女人的天職，女人只有選擇何時受孕的權利，卻不能決定她要或不要生小孩。高德曼不同於這番論調，力言女性應爭取發展自身情慾的自由，以及避免不想要的受孕，讓性行為成為一種享受而不是負擔。這是她為何提倡節制生育(birth control)，並強調節育對單身女性的重要性，不下於對已婚婦女之主因。<sup>114</sup>值得一提的是，高德曼的自由戀愛論，也曾受到後世女性主義史家批評為過於浪漫而不切實際，因為她低估了忌妒等人類特性、乃至於性暴力等行為，可能在自由戀愛的狀態中對女性造成的威脅。<sup>115</sup>相較之下，劍波、一波、謙弟等中國無政府主義後進，不只未接收到高德曼的論述中，在兩性平等的原則下所傳達的兩性差異訊息，也跟高德曼一樣——或許正因他們與她都秉持性善論的無政府主義理念——忽略了人性中可能存在的陰暗面，會在性愛／交自由的實踐中產生的危機。就性別意識這層意義而言，這群中國男性無政府主義青年所提出的新性愛論述，並不比高德曼的自由戀愛思想來得進化，也不見得真正有所超越。

或許鄧天喬便是因為察覺到她的愛人與同志們在開展「非戀愛」論時，所流露的男性思維，所以並未加入他們的行列。鄧天喬可謂繼

---

<sup>112</sup> 謙弟：〈非戀愛與其他〉，頁1244。

<sup>113</sup> Gordon, *The Moral Property of Women*, 55-71.

<sup>114</sup> Chalberg, *Emma Goldman*, 127-131.

<sup>115</sup> Lori Jo Marso, "A Feminist Search for Love: Emma Goldman on the Politics of Marriage, Love, Sexuality and the Feminine," *Feminist Theory* 4, no. 3 (2003): 305-320.



何震之後，第一位站在女性自身立場，大聲疾呼女性解放的必要性與各種訴求的女性無政府主義者。她以自身的女性意識，引領著自己對無政府主義的理解，在戀愛及性解放的言與行，都呼應著高德曼。至於她的男性同志們，則讓自身的無政府主義理想，主宰（或忽視）了他們的性別意識，去挪用並顛覆高德曼的自由戀愛思想，以追求不受戀愛束縛的性交自由所體現的無政府主義精神。若不論此一男性中心思維，這小群激進的、不與任何其他政黨領導的革命形式合作的無政府主義者，在譯介高德曼思想的過程中，確實彰顯了中國無政府主義吸納外來思想、同時反饋與創新的論述潛力。

## 六、結論

高德曼的情愛論述在北伐前後的中國，從攀至譯介高峰、到被（譯介者）超越與揚棄，短短不到數年時間。那是一個愛國聲浪高張，革命熱情澎湃而國家四分五裂的激昂年代。一群激進知青秉持無政府共產主義的理想，決心獻身社會革命與人類解放。他們不以謹守西方無政府主義領袖的立論為滿足，反而自覺「在社會進化的歷程中，青年人常常是要踏著老年人的屍身過去的」。<sup>116</sup> 此種進步主義的信念，以及濃厚的時代使命感，引領著這群無政府主義青年，對性愛問題展開思想的辯證。如盧劍波所言：「處在這個人類渴求自由解放的大時代當中，我們這些窮困的無產青年，便不可免地接受這時代精神的反映而大膽地表示出來」。<sup>117</sup> 他們譯介西方無政府主義的重要著作，意在尋求思想指導，以喚醒群眾，改變社會。他們對外來思想刺激的需求，也因應中國政治與社會環境的變化，而有所轉移。

從時間點與思想內涵兩方面，皆可證明「非戀愛論」的提出，是這些激進無政府主義青年接受並超越高德曼思想的表現。劍波在多篇

<sup>116</sup> 劍波：〈前言〉，頁2-3。

<sup>117</sup> 劍波：〈前言〉，頁3。

性愛論著中，經常不忘表明他們談性論愛的時代意義，及其彰顯的無政府主義思想精髓。換言之，他們談的雖然是個人極私之事，卻又是「全以社會的觀點而出發的，尤其注重於將來的社會」。<sup>118</sup> 劍波等人在譯介高德曼作品的過程中，出於解決中國社會現狀的革命困境，以及實踐無政府主義理想的雙重動機，建構起非戀愛的新性愛論述。由此，他們為中國社會描摹了一個性交無限制、並與性愛脫勾之後的理想世界：

在將來的預期的理想社會內，性愛的施與是自由的，沒有絕對的貞操，也沒有相對的貞操；貞操是不存在的，然而任何方也不能強迫對手在一定時間內只愛一個或多愛幾個，而且男的或女的也不必自己能夠多愛幾個才是新，才合乎新性道德。而且性交是自由的，只要合於雙方的同意與生理的要求，同時，為了社會計（因為我們理想的社會，絕對不是純個人主義），也要特別注意於花柳病的異性而拒絕與之交媾，這就是如培良所說，「沒有家庭和其他附屬於家庭的關係，沒有結婚和其他類似結婚的狀態，沒有自私，沒有佔有，沒有幻想和靈（——但不就是沒有性愛，性愛與母愛，兄弟姊妹愛是同樣的東西。）」<sup>119</sup>

盧劍波的新性愛論述，曾多次提及高德曼，指其自由戀愛言論曾震驚世人，被目為離經叛道。但他也強調，隨著時代轉變，「現社會的一切觀念形態 Ideologio 的內容，也必然要過著『改換價值』（Transvaluation）的運命。戀愛觀念是其一種」。<sup>120</sup> 因此，他們出於自認為時代賦予的神聖使命感，對高德曼的情愛思想做辯證性的省思與挑戰。歸根究柢，這幾位無政府主義者的非戀愛論述，批判戀愛的自

<sup>118</sup> 劍波：〈論性愛與其將來的轉變〉，頁1357。

<sup>119</sup> 劍波：〈論性愛與其將來的轉變〉，頁1352。

<sup>120</sup> 劍波：〈論性愛與其將來的轉變〉，頁1358。

私、幻想、欺騙與占有等人類劣根性，欲在徹底摒棄感情私有制的同時，實踐男女性關係的絕對自由。盧劍波、謙弟、與毛一波等人，在急切地想超越高德曼的自由戀愛思想之際，忽略了她言論中強調女性獨特問題這部分的深刻意義，逕以男性思維出發來提出性交自由這個全人類的解放訴求。但對他們而言，非戀愛論發揚了無政府主義既提倡互助合作又維護個人自由的精神，在追求個人性解放的同時，也不受私戀羈絆，得以保留對社會與人類愛的重視，可謂他們創發的由私入公的終極革命。

劍波與謙弟這幾位川籍無政府主義者，之所以能發展出獨樹一幟的「非戀愛」激進言論，投身並參與革命大業，除因他們具有另闢革命話語的勇氣之外，實與1920年代中後期，中國政治分裂所釋出的某種開放性言論空間有關。一旦政治革命隨著北伐統一而結束，訓政階段開始並加強言論管控後，社會氛圍轉移；原有的論述空間，開始遭到擠壓。時至1929年，即《新女性》發刊最後一年，盧劍波、張履謙、毛一波、巴金及鄧天喬等四川無政府主義者的作品，在該刊全面消失。日後盧劍波、毛一波及巴金等人，都仍陸續在散文、小說與專著各方面進行創作。他們在精神上仍景仰著高德曼，且未完全拋棄他們當年對無政府理想的寄望。<sup>121</sup>不過，「非戀愛論」這個「性要求完全解放的第一宣言」，則不復高唱。這番正面回應乃至凌駕歐美思想的一時之論，其激越的程度，充分展露無政府主義思想的革命性。「非戀愛論」雖屬曇花一現，但它批判愛倫凱所代表的戀愛結婚、靈肉一致說，並對高德曼提倡的自由戀愛論進行辯證性思考與超越的嘗試，可說在相當程度上，豐富了1920年代後半期中國社會思索兩性情、愛、慾的論述。

（責任校對：唐雨薇）

<sup>121</sup> 例見巴金：〈給EG〉，《巴金自傳》，頁197-199；盧劍波：《社會變動中兩個婦女型》，《憧憬》第1卷第6期（1933年），頁3-5。

## 徵引書目

- 一波：〈克魯泡特金的婦女觀〉，收於一波、劍波、謙弟：《婦女問題雜論》，上海：出版合作社，1927年，頁16-20。
- 一波：〈序〉，收於一波、劍波、謙弟：《婦女問題雜論》，上海：出版合作社，1927年，頁1。
- 一波：〈我的戀愛觀〉，《新女性》第2卷第7號，1927年7月，頁717-718。
- 一波：〈非戀愛的又一聲——質章錫琛先生——〉，《新女性》第4卷第3號，1929年3月1日，頁329-337。
- 子穀（蘇曼殊）：〈譚苑·女傑郭耳縵〉，收於東大陸圖書譯印局編：《國民日日報彙編》第3集，上海：東大陸圖書譯印局，1904年，頁801-803。
- 天心（沈仲九）：〈告共產黨的青年（下）〉，《民鐘》第2卷第4、5期合刊，1927年5月25日，頁265-286。
- 天喬：〈我們的結合〉，《新女性》第2卷第1號，1927年1月，頁125-126。
- 天喬：〈論婦女解放與遺產繼承權運動〉，收於一波、劍波、謙弟：《婦女問題雜論》，上海：出版合作社，1927年，頁147-154。
- 天喬：〈讀「自由的女性」〉，收於天喬、劍波：《婦女解放與性愛》，上海：泰東圖書局，1928年，頁201-205。
- 尹文彬：〈高曼女士文集〉，《新女性》第1卷第10號，1926年10月。
- 巴金：〈信仰與活動〉，《巴金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頁403-407。
- 巴金：〈家庭的環境〉，《巴金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頁380-402。
- 巴金：《巴金自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5年。

- 毛一波：〈再論性愛與友誼〉，《新女性》第3卷第11號，1928年11月，頁1248-1258。
- 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一九二〇年代中國三大政黨的實際互動〉，《歷史研究》第5期，2004年10月，頁84-105。
- 何香凝：〈國民革命是婦女唯一的生存〉，收於廣東省檔案館、廣東婦女運動歷史資料編纂委員會編：《廣東婦女運動史料（1924-1927）》，廣州：廣東省檔案館，1983年，頁2-4。
- 呂芳上：〈192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有關情愛問題的抉擇與討論〉，收於呂芳上編：《無聲之聲（1）：近代中國的婦女與國家（1600-1950）》，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頁73-102。
- 李存光編：《無政府主義批判：克魯泡特金在中國》，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
- 作者不詳：〈克魯泡特金的「無治主義略說」〉，上海《民國日報》第1-2版，覺悟副刊，1920年8月9日。
- 作者不詳：〈高曼女士〉，《民聲》第21號，1914年8月2日，頁241。
- 作者不詳：〈通信討論欄·答岸父〉，《民聲》第18號，1914年7月11日，頁12。
- 作者不詳：〈通信討論欄·答岸父（續十八號）〉，《民聲》第20號，1914年7月25日，頁12。
- 作者不詳：〈無政府主義書刊名錄〉，收於葛懋春、蔣俊、李興芝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頁1069-1087。
- 作者不詳：〈新刊介紹〉，《天義》第6卷，1907年8月，頁36。
- 李芾甘：〈俄羅斯革命中的婦女補〉，《新女性》第1卷第4號，1926年4月，頁261-264。
- 孟慶澍：《無政府主義與五四新文化——圍繞《新青年》同人所做的考察》，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6年。

- 季家珍著，楊可譯：《歷史寶筏：過去、西方與中國婦女問題》，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
- 阿里夫·德里克著，孫宜學譯：《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6年。
- 柯惠鈴：《她來了：後五四新文化女權觀，激越時代的婦女與革命，1920-1930》，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8年，頁176-179。
- 美國高曼女士著，震瀛譯：〈近代戲劇論〉，《新青年》第6卷第2號，1919年2月，頁179-195。
- 美國高曼女士著，震瀛譯：〈結婚與戀愛〉，《新青年》第3卷第5號，1917年7月，頁1-9。
- 唐金海、張曉雲：《巴金的一個世紀》，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04年。
- 涓聲譯：〈美國無政府黨之歷史〉，《民聲》第5號，1914年4月11日，頁54-55。
- 秦抱朴：〈回憶早年留俄及與高德曼相識的經過〉，手抄本。
- 袁振英：〈袁振英的回憶〉，收於葛懋春、蔣俊、李興芝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頁971-981。
- 高曼女士著，超海譯：〈愛國主義〉，《實社自由錄》第1集，1917年7月，頁1-5。
- 高德曼女士（Miss Emma Goldman）著，李芾甘譯：〈婦女解放的悲劇〉，《新女性》第1卷第7號，1926年7月，頁520-521。
- 高德曼女士著，李芾甘譯：〈斯特林堡底三本婦女問題劇〉，《新女性》第3卷第4號，1928年4月，頁431-454。
- 高德曼原著，菁華清譯：《布爾什維克之暴政》，見葛懋春、蔣俊、李興芝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頁1083。
- 高露曼女士著，霜譯：〈無政府主義〉，《實社自由錄》第1集，1917



年7月，頁5-8。

培 良：〈戀愛破滅論〉，收於劍波編：《戀愛破滅論》，上海：泰東圖書局，1928年，頁1-40。

章錫琛：〈我的戀愛貞操觀——寫在謙弟劍波兩君的文後〉，《新女性》第2卷第5號，1927年5月，頁533-536。

章錫琛：〈結婚與戀愛的定義〉，《婦女雜誌》第9卷第6號，1923年6月，頁119。

許慧琦：〈1920年代的戀愛與新性道德論述及其演變——從章錫琛參與的三次論戰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16期，2008年12月，頁29-92。

陳碧蘭：《我的回憶》，香港：十月書屋，1994年。

葛懋春、蔣俊、李興芝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

楊聯芬：〈愛倫凱與五四新文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2年第5期。

楊聯芬：〈「戀愛」之發生與現代文學觀念變遷〉，《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1期，頁158-208。

鳳 子：〈女子解放與女子教育〉，《婦女雜誌》第10卷第11號，1924年11月，頁1662-1675。

劉慧英：〈從女權主義到無政府主義——何震的隱現與《天義》的變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年第2期，頁194-216

劍波、履謙：〈敬告四川同志〉，《國風日報》第5-6版，第172期學匯副刊，1923年4月19日。

劍 波：〈女性的解放〉，收於天籟、劍波：《婦女解放與性愛》，上海：泰東圖書局，1928年，頁62-83。

劍 波：〈男女鬥爭與男女互助〉，收於天籟、劍波：《新婦女的解放》，上海：泰東書局，1928年，頁64-69。

劍 波：〈性愛與友誼〉，《新女性》第3卷第7號，1928年7月，頁

- 740-741。
- 劍波：〈非戀愛與戀愛貞操〉，《新女性》第2卷第8號，1927年8月，頁835-847。
- 劍波：〈前言〉，收於劍波編：《戀愛破滅論》，上海：泰東圖書局，1928年，頁1-3。
- 劍波：〈談「性」〉，《新女性》第3卷第8號，1928年8月，頁868-876。
- 劍波：〈論性愛與其將來的轉變〉，《新女性》第3卷第12號，1928年12月，頁1357。
- 劍波編：《戀愛破滅論》，上海：泰東圖書局，1928年。
- 蔡國裕：《一九二〇年代初期中國社會主義論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8年。
- 蔣俊：〈盧劍波先生早年的無政府主義宣傳活動紀實〉，收於葛懋春、蔣俊、李興芝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頁1009-1022。
- 鄭佩剛：〈無政府主義在中國的若干史實〉，收於葛懋春、蔣俊、李興芝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下，頁939-971。
- 盧劍波：〈序言〉，收於高德曼女士著，盧劍波譯：《自由的女性》，上海：開明書店，1927年。
- 盧劍波：《社會的價值與變革》，上海：啟智書局，1929年。
- 盧劍波：《社會變動中兩個婦女型》，《憧憬》第1卷第6期，1933年，頁3-5。
- 謙弟：〈我所認為新女子者〉，收於一波、劍波、謙弟：《婦女問題雜論》，上海：出版合作社，1927年，頁174-193。
- 謙弟：〈近代的兩性結合〉，《新女性》第3卷第11號，1928年11月，頁1258-1262。
- 謙弟：〈非戀愛與其他〉，《新女性》第3卷第11號，1928年11月，頁1237-1248。

- 謙 弟：〈非戀愛與戀愛〉，《新女性》第3卷第5號，1928年5月，頁501-525。
- 謙 弟：〈戀愛貞操新論〉，《新女性》第2卷第5號，1927年5月，頁525-531。
- 顧德琳 (Gotelind Müller) 著，洪靜宜譯：〈知易行難：中國無政府主義的婦女性別論述及其落實限制〉，收於游鑑明、羅梅君、史明主編，洪靜宜、宋少鵬等譯：《共和時代的中國婦女》，臺北：左岸文化，2007年，頁62-86。
- Emma Goldman 女士著，劍波譯：〈俄羅斯革命中的婦女〉，《新女性》第1卷第4號，1926年4月，頁253-260。
- Emma Goldman 著，劍波譯：〈結婚與戀愛〉，《新女性》第2卷第1號，1927年1月，頁81-92。
- Goldman 著，芾甘譯：〈瑪麗亞司皮利多諾瓦的迫害事件〉，《民鐘》第1卷第10期，1925年1月，頁21-24。
- Hippolyte Havel 著，盧劍波譯：〈愛瑪高德曼傳〉，《新女性》第2卷第3號，1927年3月，頁429-446。
- Hippolyte Havel 著，盧劍波譯：〈愛瑪高德曼傳（續）〉，《新女性》第2卷第4號，1927年4月，頁269-284。
- “Observations and Comments.” *Mother Earth* 3, no. 9 (November 1908): 340.
- Avrich, Paul. *The Haymarket Traged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 Butler, Brenda. Lu Jian-Bo. 1 November 1989. Emma Goldman Archiv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alifornia, USA.
- Chalberg, John C. *Emma Goldman: American Individualist*. New York: Pearson Longman, 2008.
- Dirlik, Arif. *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 Fessenden, Tracy. *Culture and Redemption: Religion, the Secular, and*

- American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 Ferber, Abby L. *White Man Falling: Race, Gender, and White Supremacy*. Bost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9.
- Goldman, Emma. "Free Communism." *Mother Earth* 7, no. 5 (July 1912): 155.
- . "Women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n *The Emma Goldman Papers: A Microfilm Edition*, edited by Candace Falk et al. Alexandria: Chadwyck-Healey Inc., 1991-1993. Reel 50.
- . *Living My Life: An Autobiography of Emma Goldman*, Vol. On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31.
- . "Methods of Birth Control." In *The Emma Goldman Papers: A Microfilm Edition*, edited by Candace Falk et al. Alexandria: Chadwyck-Healey Inc., 1991-1993. Reel 53.
- Gordon, Linda. *The Moral Property of Women: A History of Birth Control Politics in Americ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2.
- Hsu, Rachel Hui-Chi. "Cross-Cultural Sexual Narratives and Gendered Reception in Republican China." *The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14, no. 1 (2020): 111-134.
- . "Rebellious Yet Confined: Women Dissenters on Love and Sexual Morality in the *Ladies' Journal* and the *New Woman*." In *A Space of Their Own: Women and the Periodical Press in China's Long Twentieth Century*, edited by Joan Judge, Barbara Mittler, and Michel Hockx, 158-17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 Jackson, Margaret. *The Real Facts of Life: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c1850-1940*.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1994.
- Lee, Haiyan. *Revolution of the Heart: 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 1900-1950*.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Liu, Lydia H., Rebecca E. Karl, and Dorothy Ko, eds. *The Birth of Chinese Feminism: Essential Texts in Transnational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 University Press, 2013.
- Marsh, Margaret S. *Anarchist Women, 1870-1920*.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Marso, Lori Jo. "A Feminist Search for Love: Emma Goldman on the Politics of Marriage, Love, Sexuality and the Feminine." *Feminist Theory* 4, no. 3 (2003): 305-320.
- Shulman, Alix Kates. "Dancing in the Revolution: Emma Goldman's Feminism." In *Feminist Interpretations of Emma Goldman*, edited by Penny A. Weiss and Loretta Kensinger, 241-253. Pennsylvania: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Weeks, Jeffrey. "Havelock Ellis and the Politics of Sex Reform." In *Socialism and the New Life: The Personal and Sexual Politics of Edward Carpenter and Havelock Ellis*, edited by Sheila Rowbotham and Jeffrey Weeks, 141-185. London: Pluto Press, 1977.
- Wexler, Alice. *Emma Goldman in Exile: From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o the Spanish Civil War*. Boston: Beacon Press, 1989.
- . *Emma Goldman: An Intimate Lif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4.
- Yeh, Wen-hsin. *Provincial Passages: Culture, Space,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